

西  
LOOKING BACK  
TO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城 追 忆

1  
2018  
总第67期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陶然亭地区曾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  
寻访当年宣武区的“公社大楼”  
“飞泉”颂改革 古琴沐春风  
看御海的水城文化  
我在北京育才小学写书留墨字

总第67期 2018年3月出版

准印证号

京内资准字2006-L001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8号

邮政编码：100054

联系电话：(010) 83976501

(010) 83976494

E-mail: Xczy8806@126.com

编委会

主 编：李茂福

副主编：李 勇 金 梅 汪 杰

编 辑：张小丽 符 欣 江 成

孟 霞 庞 晨

摄 影：陈淑运

题 字：爱新觉罗·溥任

封 面：复兴门门洞(1954年)

封 底：改造后的新版复兴门彩虹桥

敬告各界读者

●本刊不退稿，请留底稿。

●作者来稿必须是著作权人或依法享有发表权的公民，如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并对由此给本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刊已纳入《北京西城往事》、北京西城档案信息网。凡《西城追忆》发表的文章在以上书籍、网站采用，不再重复支付稿费。如对此持有异议，来稿时请事先说明。

# 目录 Contents

## 兰台动态

- 01 西城区领导到区档案局(馆)慰问干部职工
- 02 区档案局传达学习李明华局长在全国档案局馆长会议上讲话精神
- 03 区档案局组织学习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 04 西城区档案局召开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会

## 专稿——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 05 “飞泉”颂改革 古琴沐春风  程世佐
- 08 亲情——千山万水隔不断  康广云

## 红色记忆

- 11 陶然亭地区曾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  王克昌
- 13 八道湾11号——鲁迅三兄弟故居  李媛媛

## 档案记忆西城

- 20 寻访当年宣武区的“公社大楼”  邱崇禄
- 22 忆自行车存车处往事  原启长

# 西城追忆

爱新觉罗溥任



## 口述纪实

25 梨园耕耘 锲而不舍

——探访刘嵩崑先生与戏曲结缘的一生  刘嵩崑/口述 庞晨/整理

29 我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的日子（一）  王民培

39 李友新先生的执教生涯（一）  李明德

## 西城故事

44 文化名流与来熏阁的书缘  赵淑珍

47 褚连祥与西来顺  满恒先

## 老城名片

50 什刹海的水域文化  于永昌

52 槐宝庵今昔谈  董宝光

## 档案信息

57 西城区档案局积极完善全流程标准化的服务格局等21  
则信息



更多精彩内容请微信搜索  
“西城档案”或扫描二维码

本刊如有印刷、装订问题，编辑部予以更换

## 西城区领导到区档案局（馆）慰问干部职工时指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首善标准做好首都核心区的档案工作



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杜灵欣（左三）、西城区政协主席章冬梅（左一）率领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到区档案局（馆）慰问干部职工

2018年2月22日，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杜灵欣，政协主席章冬梅率领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集体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来到区档案局（馆）慰问看望档案局干部职工，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区领导看到档案局（馆）干部职工精神饱满坚守在工作岗位非常满意，勉励同志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工作，勤奋敬业，以“红墙意识”践行“四个意识”，以首善标准做好首都核心区的档案工作。

新年的一年，西城区档案局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国和北京市档案工作会各项工作部署，持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深入开展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促进全区档案事业发展生动实践当中，使全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档案利用体系建设、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档案法制工作、档案干部队伍建设得到新的加强。以机关党建为龙头，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以依法治档为关键，继续加强档案法制建设，以依法治档为关键，继续加强档案法制建设，以坚定文化自信为根本，继续加强档案资源建设，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核心，继续加强档案利用体系建设，以档案馆（室）建设为基础，加强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切实履行好“为国守史，为党管档”的神圣职责。

## 西城区档案局传达学习李明华局长 在全国档案局馆长会议上讲话精神

2018年2月6日西城区档案局召开局务会，传达学习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全国档案局（馆）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北京市档案局召开局（馆）长会议精神。会议充分认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档案事业发展的成绩及档案工作面临的形势，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努力开创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把握新时代的客观规律，补齐短板，着力解决档案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018年西城区档案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国和北京市档案工作会各项工作部署，持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践行“红墙意识”，深入开展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促进全区档案事业发展生动实践当中，使全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档案利用体系建设、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档案法制工作、档案干部队伍建设得到新的加强。

## 开拓进取 戮力同心 协调推进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2018年3月19日，西城区档案局召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丁薛祥同志到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调研讲话精神，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崔述强讲话精神和全市档案工作会议精神，全面部署2018年档案工作。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必须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必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责任，紧盯风险点，必须强化折子工作的落实，以更多的档案工作成果推动首都核心区建设，将十九大精神真正贯彻到位，落地生根，形成推动首都档案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把祖国首都核心区的档案事业提高到新的水平。西城区档案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中央重大政治宣传主题，全面服务西城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大局，把握大势，稳中求进，开拓创新，统筹谋划档案事业全面发展。

## 西城区档案局组织学习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3月5日，区档案局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学习内容为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茂福同志主持会议，科长以上干部参加学习。

学习相关文件后，大家踊跃发言，一致认为，宪法乃九鼎重器，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与过去4次修宪一样，这次修宪，是再次把人民的意志凝结为党的意志，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中央在人代会召开前一周提出修宪建议，非常及时，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坚决拥护。

李茂福同志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宪法者，政府之构成法，人民之保证书也。”宪法和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基石，只有因时而发展，因事而完善，服务于时代发展，服务于复兴需求，才能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进一步引领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保证党和国家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取得新发展，开创新伟业。

他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让宪法通过实施获得生命，使宪法真正成为塑造人们行为和观念的力量，才能真正彰显宪法价值。在推动区档案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要把修宪精神贯穿于管档治档的实际工作中，联系实际、入脑走心，在学深悟透、知行合一上下功夫、见成效。特别是要结合即将开展的档案馆日活动，进一步加大宪法宣传力度，做好宪法内容的普及工作，把学习宪法焕发的热情，转化为推动局档案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推动局档案工作创新思路的重要举措。

## 西城区档案局召开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会



西城区档案局局长李茂福同志与领导班子成员、主管领导与分管科长逐级签订了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责任清单

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和区纪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近日,西城区档案局召开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会,全局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勇代表局党组,部署了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2018年工作要点经局党组会议集体研究确定,提出持续强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要把对党忠诚作为最根本的党性要求,继续从严执纪,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要固本培源,着力夯实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要结合实际,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党员干部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同时提出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局馆长与领导班子成员、主管领导与分管科长逐级签订了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结合岗位特点、具有个性化的责任清单,明确了责任。

会上观看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片《毁于小节的悔恨人生》,以反面典型为警戒,教育全体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坚决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茂福代表党组提出要求:要更加坚定政治方向,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强化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更加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责任,促进档案工作“折子工程”的落实,以更多的档案工作成果,推动首都核心区档案事业的发展。

## “飞泉”颂改革 古琴沐春风

□ 程世佐

我家曾有一架唐代古琴，名“飞泉”，它是我父亲程宽于上世纪30年代收藏的。从此，保存好这件国宝级别的古琴，就成了我父亲一生的目标。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文化建设底子薄，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被冲破，我父亲正是看好了改革后大好的形势，才在1980年将自己演奏、珍藏数十年的那把唐贞观二年制“飞泉”古琴（属国家一级文物）捐献给国家，现由故宫博物院珍藏。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段献琴背后的故事。

### 琴缘

早在20世纪30年代，父亲受好友的影响，就很爱古琴。他当时在北平工作，身为贫民工厂厂长兼阜民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古琴名家夏莲居在北海团城组织琴社，经介绍，父亲拜古琴名家管平湖为师，开始学琴，兴趣渐高后，便想买琴。适逢此时，父亲听一朋友透露，日本商人欲高价收购一架“飞泉”古琴，为避免古琴“飞泉”流落异邦，经几位朋友多方斡旋，父亲不惜重金将其抢购到手。

从此，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演奏不止。我也就在父亲年复一年弹奏的古琴曲中成长起来。激荡心弦的“高山流水”，清幽飘逸的“平沙落雁”，动人心魄的“广陵散”无不使我陶醉其中，也使我日渐深爱“飞泉”古琴和古琴文化。

### 藏琴

“飞泉”琴身通长122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4.5厘米、厚4.5厘米，形制古朴，红漆秀美，玉珍蚌徽，呈连珠式，小蛇腹间冰断纹。音响如金

石，清雅高古，诚属神品。可谓在寥若晨星的传世唐琴中难得的一件珍品。

“飞泉”琴名以草书镌刻在琴背龙池上方，下有一寸半方形双边印，篆刻“贞观二年”4字。龙池下方刻篆文“玉振”方印，及“金言学干卢赞”双边长方印各一。池之两旁还篆刻铭文“高山玉溜，空谷金声。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适幽情。天地中和，万物咸亨”32字。它记载了“飞泉”的特征，是研究唐琴珍贵文献。“飞泉”琴腹内有墨书“古吴汪昆一重修”。从“贞观二年”的方印看，距今有近1400年的历史。经专家鉴定琴上的字迹为唐人手笔。

据《琴学丛书》和《今虞琴刊》载，此琴在民国初年为北平琴坛名器之一，曾为古琴藏家李伯仁所有。约在1920年间，李伯仁居住京师时，遇一位壮士，自称高阳剑侠的儿子，因为其父病重，出售一琴一剑，李便以百金将其买下。李见古琴残旧，非常惊讶：“我还是在学徒时就曾在琉璃厂的来熏阁里见过它，到如今已有60多年，没想到它还在京城。60年前它曾为前清刑部某主事所有，但是这个官员既不懂音律也不懂得欣赏琴，把‘飞泉’当字画一样挂在墙上，任它落满灰尘。”

琴家爱琴虽不能说都是视琴如命，但远远胜过珠宝金银的说法是绝不会夸张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的反动派特务横行，文物稍有名气，主人即被骚扰，父亲还曾无辜入狱。为了保护古琴，父亲将“飞泉”藏在一位琴友家，才躲过特务们的垂涎虎视。

新中国诞生后，“飞泉”古琴终于得见天日。

### 护琴

时光荏苒，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期间，父亲和重病的母亲回故乡，因母亲重病同行，因为携带古琴不便，遂将“飞泉”托付给我保存。

父亲的珍爱和重托，催促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飞泉”受损！我将挂在墙上的“飞泉”取下，小心翼翼地套上丝绵琴套，放入琴盒，用棉线绳拴在床板下，距地面约有一尺多高。将“飞泉”隐藏好，我的心情才平静些。

1967年春天，为确保“飞泉”的安全，我决定搬家。经房管所一位老师傅帮忙，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一家合适的换房户。我以车辇店的两间南房换到了大经厂西巷的一间北房。虽是以大换小，但因是北房，既朝阳又能避光，屋内干湿度适中，且院子里只有一家邻居，房主是一青年工人，环境简单清静是再好不过了。“飞泉”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安身之所。依照以前的“隐蔽”方法重新把“飞泉”安置好，我的心总算又踏实下来。

平时，我与邻居相处不错，但绝不向任何人透露“飞泉”之事。好不容易又度过了动荡的8年。

1974年的冬天，我家遭遇了一次小偷光临。当时我在单位值夜班，第二天一大早领导打电话告诉我家门被撬。等我赶回家查看，只是桌上的一本小说、抽屉里的两元钱及桌上的一件上衣被偷走，床下的“飞泉”却没被发现。“飞泉”竟又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一劫。随后，我和邻居给院门也加了锁，自此安全系数增加了不少。

为了避免琴体被擦划和磕碰，我很少取出“飞泉”，除了过年或换季时需要查看一下以外。

然后伴随“飞泉”的总是多舛的命运。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正值凌晨4点钟，我从睡梦中被惊醒。在天摇地动中，我的住房外山墙居然顷刻之间轰然塌倒半片，屋内的我和“飞泉”尽管都命悬一线，最终却

都安然无恙，真是万幸。“飞泉”经此又躲过了一次天灾。

没想到刚过两天，年过古稀的父亲竟冒着余震的危险，不远千里坐火车赶来北京。见到我和“飞泉”都安然无事，高兴得连声说：“好，好，太好了！”为防不测，父亲把“飞泉”取走并亲自带回老家保管。

### 献琴

1979年，建国30周年，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国家复兴，伟大祖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父亲探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一路上看到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慨万千。路过北京，父亲见到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意欲将“飞泉”捐献给国家。想到平时父亲时常教育我们，事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况且从长远看，把“飞泉”捐献给国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为此，我十分敬佩父亲的胸怀，明确表示赞成，支持他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帮父亲立刻写信给有关部门。

1980年5月，81岁高龄的父亲接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通知，表示接受捐献。为了慎重起见，他于6月又不远千里亲自送琴到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托故宫博物院代收保管，并颁发了奖状、奖金。《北京晚报》《山西日报》《运城报》《平陆文史资料》《文化娱乐》《群众文化》等报纸杂志，都作了翔实报道。

面对国家的褒奖，父亲情激意切，浮想联翩，赋诗一首，原诗是这样写的：

我有大唐琴一张，“飞泉”艺苑久名扬。  
形制富丽出内府，声音雅润叶宫商。  
因救古珍到我手，肯使文物流异邦？  
欣逢建国三十年，也教逸品为国光。  
捐献“飞泉”意若何？千年古珍有寄托。  
推出小家归大家，不肯独乐与众乐。  
民族盛衰关文化，国家兴亡在礼乐。  
但期文风能兴起，谁想国家奖励多！

## 琴声

1984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专程采访父亲，请他弹奏“飞泉”并录音。国家一级文物一般不轻易出库，因为他是“飞泉”的原主人，所以故宫博物院特批录音在故宫中进行。由于条件限制，前后录了两次才成功，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弹奏“飞泉”。不久，父亲在从北京回山西老家的火车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用“飞泉”演奏的《流水》和《平沙落雁》的琴声，不禁老泪纵横……

“盛世兴寻宝”，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民间收藏之风又起。2010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为一张古琴举办了专场演奏会。父亲当年的恩师挚友管平湖先生留下的一把“晋泰康二年”款“猿啸青萝”琴以1904万元成交。有亲友说：“要是古琴‘飞泉’不捐献，现在不是给子孙们留了一大笔财富吗？”30年前，我的弟弟妹妹都还年幼，身在外地，对父亲的家国情怀了解不多，为了让我们全家重温父亲当年“捐献‘飞泉’意若何，千年古珍有寄托。推出小家归大家，不肯独乐与众乐”的情怀，我特意写信给故宫博物院希望为我们安排一次捐赠者后人与文物的见面会。后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同志接受了我的意见，亲切地与我们座谈，并取出“飞泉”古琴让家人们观瞻，据悉这种活动在故宫尚属首次。我们一家老少三代人与“飞泉”合影，同时屋里播放着198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父亲用“飞泉”演奏的《平沙落雁》等古曲。父亲30年前那苍劲、悠扬的琴声和我们的心声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千百年来，“飞泉”颠沛流离，辗转流传，终于受到党和国家的珍藏和保护。更难得的是“飞泉”琴音沉细温润，这是它经历了千年以上的自然变化，更是得益于一代代收藏者爱护、修缮才炼成的独特韵味。它的优美琴声飘过了千年，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飞泉”的琴声依然余音袅袅……



1984年，笔者父亲程宽先生（时年81岁）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邀于建国35周年前夕赴京，在故宫弹奏“飞泉”并录音



2010年，笔者（左四）为感恩与“飞泉”见面活动的圆满成功赋诗一首，并与故宫博物院郑院长（左五）合影，又将其缩写成三言《君重见》并隶书横卷

## 亲情——千山万水隔不断

□ 康广云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已经离开我们26年的母亲、上世纪5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大姐、还有那在我国使用达40多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的“特殊票证”。

26年前，在整理老人遗物时，我从箱子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几层厚纸叠成的小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沓子原先使用的粮票。有全国通用粮票，也有北京市粮票。有半市斤、壹市斤、叁市斤等各种面值的，总共贰百多斤。票面上有“1965”“1966”字样，看来，母亲已经把它们收藏20多年了。这些粮票便成为母亲的遗物了，也是母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物”。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收藏起来，每当我看到它们的时候，总是心情激荡，睹物思人，感受到浓浓的亲情；每每看到它们的时候，总是会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上个世纪60年代。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家是如何度过困难时期的呢？

我们家一共五口人，除了父母，就是我们姐弟三人。我大姐1956年在北京财经学校毕业。当时，学校负责全国分配工作，我大姐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条件，响应学校提出的“支援祖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号召，毅然奔赴外地，当了一名财会人员，



1966年全国通用粮票伍市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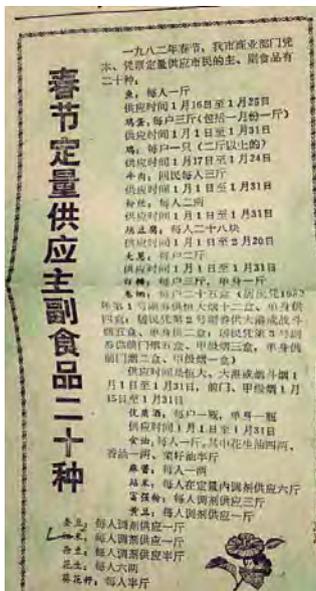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二姐比我大五岁，在困难时期，她上中学，我上小学。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不发达，商品供应紧张。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启了凭票购买生活日用品的“票证时代”，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结束。那个时候，主、副食品，日常用品都需凭票，与吃相关的票证有：粮票、肉票、食油票、黄豆票、盐票、糖票等等。



“票证时代”人们抢购的景象

在上世纪60年代实行“票证时代”的时期，吃粮食要凭粮票购买。粮票是有计划地定额发放，每月定期发放到每个家庭。当时，粮票是十分珍贵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凭钱不能买到粮食，必须和粮票一起，才能够买到食品。可以说，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在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副食品奇缺，粮票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家家粮食不都够吃，生活较为紧张。



一份1982年的报纸上刊登有关春节期间副食品供应情况的报导

为了缓解家中困难，我大姐在外地省吃俭用，每月到指定的机构，把节省下来的当地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然后邮寄给北京的家人。全国通用粮票，各地是可以通用的。

母亲每次收到粮票，都会轻轻捧在手里，一边看着，一边流泪。母亲不管多么困难，也舍不得使用它们。她常常说道：“粮票是咱们家的命根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它们。”我那时看在眼里，默默地记在心上。在困难时期，大姐就这样时常惦记着家人，克制自己，把节省下的粮票寄给我们用，真令我们感激涕零。当时，我们也时时想念着她，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姐姐。真可谓“血浓于水呀”！母女之爱，姐弟之情，是千山万水也隔不断的。

那个时候，为了克服困难，度过难关，1961年1月，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转过

来，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对于贯彻落实八字方针进行了部署。不久，中央又设立财经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负责经济的调整工作。陈云将调整方针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陈云和中央财经小组的主张与举措，对于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岁月，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但是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不叫苦，不喊累，不畏艰辛，坚定信念，共度难关。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努力，终于带领人民度过难关，迎来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局面。

经济状况稍有好转，市政府就作出决定：凡有中小学学生的家庭，每月都增加粮食供给量，以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和我二姐也不例外，每月都领到了补助粮票，为此，我家吃饭已经不成问题，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

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现在回忆起来，是亲情支撑着我们一路走来。

从1980年以后，全国各省区先后推行农村“包产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热情与积极性，促进以后连年丰收，促使主、副食品供应日趋丰富起来。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是吃不饱，但心里已经不慌，因为毕竟有粮食吃了。到1982年春节，北京市居民依然凭本、凭票定量购买粮食及其生活日用品。例如，1982年，北京市市民春节期间，鸡蛋每户供应三斤，食油每人一斤，富强粉每人三斤，黄豆每人一斤，鱼每人一斤，优质酒每户一瓶，单身视为一户也供应优质酒一瓶等。1982年春节市民的主、副食品供应种类已经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增多，供应量也明显加大。



如今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商品丰盈，这一时期取消了各种票证，告别了“票证时代”。1992年2月24日是我母亲80诞辰，为了给母亲做寿，我大姐特地从武汉来到北京。她的女儿在外交部工作，此时，也恰巧从国外回到北京。我和二姐早已成家立业，也都有了子女，全家十几口人欢聚一堂，为老人家拜寿。这一天，我母亲特高兴，她对大伙儿说：“现在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不愁吃、不愁穿，生活一天比一天强，像那芝麻开花节节高哇！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母亲那语重心长的话语，时隔26年，仿佛还在我们的耳畔回响，让我难以忘记。

的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大发展，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粮食丰足；鸡鸭鱼肉，样样齐全；各种蔬菜敞开供应，各种水果一应俱全，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人们乐见其成，分享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如今，人们追求的不只是吃饱吃好，还要讲究饮食结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吃出品味。由此可见，人们的消费

观念悄然发生改变，人们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不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无限活力，而且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追忆往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真正领会到“国富民强”和“国泰民安”的真谛。

时光飞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满满的回忆，我们有过忧伤，我们有过苦楚，但最后我们还是战胜困难，挺过难关，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终于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如今，人们确实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体味到现在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人们不仅有获得感、认同感，而且有满足感、幸福感。

抚今思昔，我们要更加珍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更加珍惜我们现在幸福生活，更加珍惜我们伟大的新时代。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 陶然亭地区曾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

□ 王克昌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了！许多媒体纷纷报道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光辉著作，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70年后，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早在1916年之前，在日本学习期间就攻读了《共产党宣言》，他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6年5月他回到国内。他在陶然亭地区的丞相胡同主编《晨报·副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该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

1919年2月7日李大钊主持增加了“自由论坛”“译丛”两栏目，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就发表在副刊上，还刊登世界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的传记。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专栏长达半年之久。副刊在马克思诞辰104周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

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事迹同时，还在陶然亭地区米市胡同79号主办“五四”运动期间重要的报纸——《每周评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三位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共同创办的主要报纸，颇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的姊妹篇，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报纸。就在这张报纸上公开登载《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1920年陈望道同志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里比他要早公布一年之久。

近代陶然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重要阵地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同志不仅工作在陶然亭地区的丞相胡同和米市胡同，还因工作的繁重居住在这两个胡同里。然而，他居住和工作较长的还是陶然亭公园内的古刹慈悲庵内。从1921年至1923年之间，借助共产党员陈愚生为妻守灵之名，秘密生活在慈悲庵西南两间庙房内。这里，他秘密接待了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高君宇、石评梅、邓中夏、恽代英、秦德君、刘伯坚、陈毅等人。以及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们。跟他们讨论救国救民的真理，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开展革命工作、如何领导工人罢工诸问题。可以说，这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

尤其值得关注的、又鲜为人知的是位于陶然亭地区果子巷南城模范讲习所。它位于果子巷北口路西朝东，临街巷五大通间，满是一大格一大格玻璃窗。它原是南城劝学所，后改为公共阅报社。这是陶然亭一带人们自由阅报、听课的公共场所。“五四”期间，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1915年，革命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创办《青年杂

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青年导师陈独秀启蒙与召唤下，大批伴随着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纷纷觉醒，以组织社团等等方式宣传“五四”新文化。陈独秀迁到北京大学工作后，《新青年》也随之来京发行。这在北京大学青年师生中影响巨大。在蔡元培校长鼓励下，学生自发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创立者有北大学生邓中夏、廖书仓、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许德珩等。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征求志同道合、有热情的同学参加，共同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推行。最初39人，后为157位，高君宇、杨钟健、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纷纷加入。该团的存世时间是1919年3月23日至1925年间。

果子巷南城模范讲习所就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光顾的地方。它不仅向平民百姓讲解文化知识，教授识字教学，更重要的是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军阀的残酷统治，揭露民众生活苦难的缘由，从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讲述马克思的光辉思想。1920年五六月份，邓中夏等人在向农村宣讲之后，来到果子巷。即将开讲了，该管片警察突然派多人阻止宣传。理由是事先没有通知警厅。高君宇等四人与警察理论。邓中夏借机登台就讲。讲毕，张国焘继之，刚一开口“今天我们来这里讲演”，警长立刻发令道“解散！”“那如狼似虎的警兵，约模有百十余人，一拥上台，把个讲台挤满了。我们见其不予理喻，只得向大伙儿高声说道：‘列位呀！我们平民教育讲演团莫非是要平民受同等教育。现在他们连

教育都不准你们享受了。’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

这次被军警破坏的讲演，原计划张国焘讲《知识的用处》，高君宇讲《“人”的生活》，杨钟健讲《个人与社会》。刚才邓中夏讲过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演》。反动军警破坏讲演，干涉北大学子的正义举动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起北大同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更大热情。他们多次避开警察仍然在这里宣讲。比如，高君宇同志就多次在此处宣讲。1920年5月31日讲了《“人”的生活》，11月14日讲了《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11月28日讲了《私产制度和婚姻》等等。当时有报道，这样的讲习所“表面上以补习为名，实际上却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讲演时，还宣传马列主义书籍杂志，如《工人周刊》《劳动音》《共产党宣言》等，那么，在果子巷讲演时，据推测也会带来进步书刊配合一次次宣讲。

果子巷南城模范讲习所再往南路东有个煤铺。一座普普通通的煤铺。在解放战争时期，这座煤铺住进抗日时期的老干部、地下工作者杨子健同志（1906.10.29—1992.11.27）。他在这里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宣讲北平政治局势，报告解放军几大战役好形势，同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这里又是一处中共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据点。

西城区陶然亭地区有多处红色阵地，以上仅涉及几处，待后人更多地去挖掘。

## 八道湾11号——鲁迅三兄弟故居

□ 李媛媛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鲁迅在北京工作生活14年，先后在北京西城地区有4处住所，分别是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西四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

不久前笔者在鲁迅文化基金会荣挺进老师的带领下，访问了八道湾11号。八道湾地处皇城西北，习惯上人们笼统称这里为西城，鲁迅当年写小说，背景除了设在他的故乡绍兴外，偶尔也设在北京西城。例如《示众》开头就写道：“在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书信或文章里提到这所住宅，有时写作“新街口八道湾”，有时也写作“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八道湾，清《光绪顺天府志》就有记载。它坐落于今天新街口南路西侧，是前公用胡同内的一个弯曲小巷。前公用胡同是较为宽敞的东西向胡同，东口外是繁华喧嚷的新街口闹市，西口出去则是赵登禹路了。前公用胡同内，有一条向北弯曲小巷，前行向西就是八道湾了。赵登禹路最早是一条从西北向东南流去的弯弯曲曲的城内金水河，民国二年出版的地图上，还有这条河的标识。后来因河道淤塞断源，变成了臭水沟，称作“大明濠”。1921年起，填沟改路，因军阀混战，直到1930年秋才填平。按照当地居民习惯，称作“沟沿”，它分作南北两端，八道湾西口附近称作“北沟沿”，所以周作人就有文章叫作《北沟沿通信》。1946年，为纪念抗日名将赵登禹将军，改称为赵登禹路。

荣挺进老师指着路面介绍道：这条改造后专门

用石板铺设的路就是鲁迅当年走着去上班的路。当年鲁迅在今天北京西城西单附近的教育街民国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任科长，负责图



笔者和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鲁迅长孙）合影

书馆、博物馆、文艺演出、公园建设，周作人在东西城交界处的沙滩北京大学任教。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在《忆录京师坊巷诗》中有一首写到他到八道湾11号拜访时的行经路线：“转角龙井头，朱门半里长。南枝霜外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缙客袂，几日未登堂。”由东皇城根、北海后门进什刹海西的龙头井，经定阜大街辅仁大学和“朱门”（庆王府）到“西庙”（护国寺）出西口转弯就到了新街口南。

正说到这里，迎面走来两位民国扮相的青年，这是马上要参加演出的35中学生，长衫飘袂，不由得让人想起曾经在这里来来往往的民国名人：蔡元培、胡适、郑振铎、李大钊、郁达夫、钱玄同、沈尹默、许寿堂、毛泽东……八道湾11号，占地700多平方米，是一个三进四个院落的大宅。当年要买



家，几乎都由鲁迅一个人承担下来，至1920年1月6日，鲁迅往本司胡同交易房契税止，鲁迅为买房忙碌前后近一年时间。他还特地接入当年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特意在宅院里种下青杨和丁香，他想着如此应当可以长住久安的了。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入八道湾。12月1日鲁迅启程回绍兴，售去祖产，“奉母偕三弟及眷属”，12月29日回到北京。

八道湾11号宅院的房契，购房人为周作人

到称心如意的四合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查看鲁迅在1919年的日记便可知：从2月11日始，由教育部同事齐寿山介绍陪同看报子街、铁匠胡同之后，同林鲁生又看屋多处，又同朱孝荃、张协和至广宁伯街看屋，其他还看了鲍家街、辟才胡同等。自5月起，由徐吉轩介绍，还看了护国寺一带房屋。直到7月10日，才和徐吉轩才看中八道湾的房屋。当月15日便量屋作图。23日决定买八道湾罗氏屋，随后验契付款。8月19日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洋1750元，另给中人酬金175元。10月5日收屋9间，交400元。11月4日鲁迅同徐吉轩再往八道湾会罗姓房主及中人，交房款1350元，收院中所有房屋毕。合计交房款洋3500余元，加上中人、木工、上下水管道、装玻璃、房屋契税等，合计费洋4385.1元。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从找房、买房到整修、购置家具、搬



鲁迅的侄儿周丰二先生绘制的八道湾宅院平面图



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八道湾故居的照片

1919年11月至1923年8月，鲁迅与母亲、夫人朱安及两个弟弟在此居住。前后3个院落，分东西两院，东院有三排北房，西部是个小跨院，有南北房。一进院落有倒座房9间，鲁迅的书房就设在中间的几间。现在去参观，房子已经翻新过了，窗外的

两株丁香也换成别的树了，不过荣挺进老师说不久以后，树也要改种回丁香，希望重现鲁迅老照片里繁花盛开的场景。

在此居住期间，鲁迅的小说创作达到顶峰：向《新青年》投稿《狂人日记》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仁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故乡》《社戏》等小说与杂文，尤其是《阿Q正传》的陆续发表，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他还出版了小说集《呐喊》，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并翻译了大批外国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在世界上有着很高声誉的《阿Q正传》。《阿Q正传》是鲁迅创作中也是整个“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篇小说，1921年12月4日起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922年2月12日止，共登9期，署名巴人。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鲁迅是第一个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作家。

在《阿Q正传》中，鲁迅不仅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彻底性及阿Q人物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而且深入挖掘了造成阿Q悲剧的思想根源。鲁迅曾说自己塑造阿Q的动机“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把农民精神所受的奴役与创伤也当作国民性的弱点来批判。这部作品面世的时候，很快受到外国作家的赞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典型。

在中院参观的时候，发现房屋里有几根柱子，很是奇怪。荣挺进老师介绍说，有北京市园林专家来参观后由柱子推断：这房屋非一般的民居，属于小王府。清末，这一地区属正红旗管辖，颇有一些尊贵住户。八道湾11号原为东邻刘姓大院（今八道湾9号）的一个附属院落。鲁迅到八道湾看房时，教育部同事钱稻孙一起去看过。那时已是民国8年，王公贵族纷纷凋零。在钱稻孙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王府”。北京城内的街巷院落，大多是明清建筑，清廷灭亡后，末路的王孙们纷纷卖掉所居府第以维持生计，尤其是规模小一些的王侯住宅开始被分割拆收。不过现在见到的前廊后厦已经不是原貌，是加了一堵外墙，把柱子包在了房内，当时整座院子装修花了1万多大洋，比房价还贵。

鲁迅母亲喜欢安静，中院北房三间，西边一间为老太太的卧室，东边一间为鲁迅妻子朱安的卧室，中间堂屋兼作洗漱和吃饭的地方。荣老师领着笔者再往后走，说一会儿会看到一个吃惊的东西。走到花园处一看，呀，“老虎尾巴”！和阜成门那个“老虎尾巴”简直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鲁迅当时任职的教育部一月工资三百大洋，但是并不能按月足额发放，有时候甚至每月只能领到六十、八十大洋。要负责一大家子，包括伙夫、佣人等的开支，实属不易。冬天取暖要用煤，为了节



苦雨斋旧照，第二排左一为沈尹默

省用煤，这里的堂屋后面就接出一间小屋，安装很大的玻璃窗，窗下摆一个长木炕，鲁迅冬天一般都睡在这里。后来鲁迅搬到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也将北屋三间改造成同样的格局。这个“老虎尾巴”在多年变迁中，已经逐渐失去原来模样了；只是后来拆迁才露出了原貌，现在看到的是经过翻新后的。

中院与后院的院子里有草坪也有花，让人联想到绍兴的百草园来。花园东侧中院西屋3间，鲁迅也住过。后来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此打架，反目成仇。这一带地势低洼，每逢下雨，即成水坑。鲁迅搬走以后，周作人将此室改作书房，取名“苦雨斋”。梁实秋先生曾这样描写过周作人的书房：“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名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待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序。外面两间

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这院子里“既使是在炎热的夏天，它也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周作人住在这里住了48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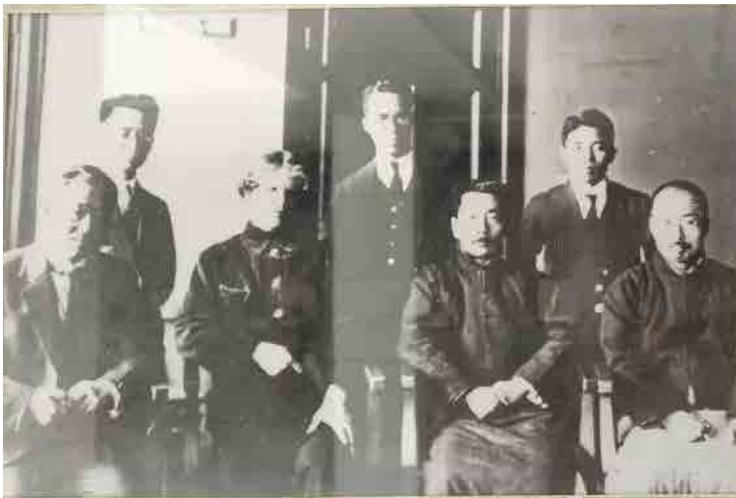
后院有9间后罩房，鲁迅胞弟周作人和周建人各用3间，东边的3间是客房。为了照顾日本弟媳的生活习惯，鲁迅特意将后院几间朝南的房子改装成日式。

大宅院后罩房最西头3间是周作人家，俩夫妇带两个孩子，中间3间是周建人家，也是俩夫妇带两个孩子。1906年，鲁迅原想去德国留学，但由于周作人在日本刚结婚，家母

无人照顾，于是去日本催促周作人一家回国。回绍兴后，羽太信子怀孕生了孩子，羽太信子不想说中国话，也不习惯在中国的生活，于是兄弟俩就商量把羽太信子当时15岁的妹妹羽太芳子从日本接到绍兴，专门伺候羽太信子坐月子。1916年，羽太芳子快20岁了，芳子自己提出来，找到大哥鲁迅作主，想嫁给周建人。鲁迅开始回避，后来没办法，就认可了，于是羽太芳子嫁给了周建人，两兄弟娶了两姐妹。羽太家在日本是城市无产阶级，没有什么经济收入。鲁迅日记中提到，在和周作人闹翻以后，鲁迅还是不断给羽太家寄钱，羽太芳子有事还找大哥鲁迅，不找周作人。周建人后来另娶了，有矛盾，还是找鲁迅，这是后话。

周建人到北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北京大学旁听，帮助两个哥哥做些翻译校对的工作，写一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章。过了一年多，经二哥请胡适帮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工作。

大宅院后罩房最东面两间，住过羽太家的小舅



鲁迅先生（前右二）与爱罗先珂（前左二）等人合影

子羽太重九，他在日本没工作，常年住在这里。

这里还住过不少客人，其中停留时间较长的是俄罗斯盲人世界语作家、诗人爱罗先珂，住了一年半。鲁迅翻译的童话集《桃色的云》就是他的作品。1922年，爱罗先珂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校长蔡元培考虑他眼睛看不见，又不通汉语，就托周家来照顾。鲁迅和周作人能讲日语，周作人则不但通英文，还自学掌握了世界语。周宅住房宽敞，鲁迅的两个弟媳都是日本人，家里通用日语，即使鲁迅和周作人不在家，爱罗先珂讲话也有人能懂。爱罗先珂邀请日本朋友为他读鲁迅的小说，对鲁迅作品中出现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阿Q感兴趣。他发出“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的呼声。

爱罗先珂喜欢热闹，在北京住了没多久，就抱怨这个城市太沉闷，作为盲人，他喜欢听各种声音。于是，盼望听见蛙鸣的他，带着周家的孩子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小水池，长三尺宽二尺，既可以聊荷花，还可以放养小蝌蚪。在蝌蚪成长过程中，孩子们会向他报告：“爱罗先珂先生，它们生了脚了……”后来又买来了小鸭子，但是鸭子嘴馋，把小蝌蚪全部吃完了。

鲁迅曾经写了《鸭的喜剧》：“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便匆匆地向赤塔去。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咻咻’地叫，都是‘鸭鸭’地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笔者在花园里已经看不见池塘了，荣挺进老师告诉我，这里也要恢复原貌：种上莲花，养

上蝌蚪。鲁迅喜欢莲花，早年曾写诗赞美其高洁：“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绍兴周氏族谱是把濂溪先生列为始祖的。

当时鲁迅还没有子女，但是弟弟们都有子女，他买房子首先想到的是儿童的健康成长的环境，他曾写道，买八道湾的房子就是因为“取其空地很宽大，易于儿童的游玩。”

此后，在这里住过的客人，有绍兴同乡，有日本朋友，还有李大钊的儿子，1927年李大钊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杀害以后，家人到处避难，周作人请大儿子李葆华在此住了大概2个月。

房子的左侧有一株古树国槐，树下有一块空地，当年羽太家的女人在这里种花种菜。因为女主人是日本人，八道湾在生活习惯上就难免有日本风味。在后院举办的年节的宴会上，会有屠苏酒、粢饼、烤鱼等日本新年食物。

当时，家中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1923年7月24日，鲁迅与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看，此可记也”。周作人在冲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突后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就从那一天起，他和鲁迅彻底绝交了。

1923年8月，鲁迅离开了八道湾。搬迁到砖塔胡同。1923年鲁迅搬出去买了西三条的房子以后，鲁迅母亲也搬过去了。鲁迅问过朱安：你是愿意回绍兴？还是愿意在这儿跟着母亲？朱安回答：你反正也需要人做饭，收拾屋子，我跟你走。参看鲁迅日记，除了1924年5月天到八道湾取书之外，鲁迅再也没回过八道湾。

1921年，周建人离开。1923年，鲁迅因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另购房屋居住，八道湾宅院留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的前妻及儿女使用。1931年11月，日本已经占领东北，日本人在华北势力猖獗，八道湾只剩下一个中国人：周作人。一旦风声

紧，日本侨民就把八道湾11号的门牌号换作“羽太家”。周作人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加入伪政府，日本投降后被逮捕判刑，后来买的八道湾15号，房产被法院没收。

1967年5月16日，周作人死在1919年自己曾专门找日本工程装修队修建的后院西侧的浴室里。

1949年以后，这个院子还驻扎过解放军一个排。许广平和周建人把属于他们的四分之三捐给了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也曾考虑在八道湾建纪念鲁迅的设施，曾有将之辟为纪念鲁迅场所或改作鲁迅小学的动议，但未能实现。

八道湾的院子也布满了“五四”人物的足迹，曾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各界人士经常来访的，两兄弟的日记中有记载：蔡元培、胡适、郑振铎、李大钊、郁达夫、钱玄同、沈尹默、许裳堂等等。1920年4月7日，初到北京住在沙滩的北京大学红楼的图书馆管理员——湖南青年毛泽东来到八道湾11号拜访周作人，周作人的日记里只记下“毛泽东君来访”几个字，谈话内容只字未提。遗憾的是，鲁迅当天不在家，毛泽东未能见到鲁迅。

因为历史原因，这么重要的一座老宅子，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陆续被三四十户人家挤住，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样子。2009年，面临拆迁。长期以来，文化界有一种呼声，希望恢复八道湾11号



搬迁到新街口地区的第35中学，把八道湾11号这所宅院圈在了校内

旧观，辟为鲁迅或周氏兄弟纪念设施，保存历史文化，留住城市记忆。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全国纪念鲁迅的机构已有六个，北京已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博物馆，不必重复建设。对此，有人举出外国的例证反驳说，在俄国，普希金的纪念设施有14处。不仅城市，就连偏远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或三山村，小路旁或树林边都能看到写着“普希金曾在此散步”“此为普希金读书处”的木牌，甚至还为普希金的奶娘建立了纪念馆。

经过多方努力，2009年，北京35中选中八道湾作为其高中部的旧址，八道湾11号被整体规划在校园内。学校请专业施工队对旧居进行了施工整理，妥善予以保护。因为李大钊曾是学校的校董，35中还设立了李大钊研究会。历史的巧合，使李大钊与鲁迅，在此再次相遇了。

这里作为周氏三兄弟故居，也是青少年的教育基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立人思想”影响了当时乃至当代的中国。不久前这里举办过展览，故居的正室布置成立人讲堂，荣挺进老师介绍：将按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在这里作一些讲座。

不久以后，这里的房间也将逐步作原状陈列。

向参观者打开鲁迅的书房，除了专门陈列展示鲁迅的藏书，还会复制一些鲁迅曾读过的图书，让读者可自由翻阅。

鲁迅亦是一位文化官员，他在职期间，参与建设了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把承德的《四库全书》调到北京，成为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他还参与创建了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先农坛公园，也是他去考察后，决定创立成公园，鲁迅还是一位艺术实践者，1917年设计了北大的校徽。预计今后，会在故居里会开设些艺术讲座，设计书法木刻画体验培训，还会设立小舞台，做课本剧的表演。

2018年，恰逢鲁迅走上文坛100周年，鲁迅带给我们不只是文学，还有太多太多。

## 寻访当年宣武区的“公社大楼”

□ 邱崇禄

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建立的进程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以配合全国农村普遍成立的人民公社。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市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这四个老城区在各自的辖区内兴建“人民公社大楼”。从1958年这几栋“公社大楼”的陆续开工，到1960年至1961年的相继建成，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就是东城区的北官厅“公社大楼”，西城区的福绥境“公社大楼”和崇文区的安化寺“公社大楼”。

在当年北京市一片灰色海洋的平房群中，这几栋“公社大楼”以拔萃的高度、亮丽的色彩、新颖的外形及鹤立鸡群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的视野中。在当时的老百姓心目中，大楼中配备的公共食堂、幼儿园、俱乐部、放映室、图书馆、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无不体现着共产主义的生活模式和理念，是件引人向往、憧憬、遐想和激动人心的大事。多少年之后，著名作家史铁生写过一篇名为《九层大楼》的散文，从一个小学二年级学生的视角，对新的“公社大楼”憧憬作过精彩的描述。

在这四个老城区中，东城、西城、崇文三个区内的三座“公社大楼”先后拔地而起，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唯独没见过宣武区“公社大楼”的建成和有关的报道。难道当年的宣武区没有“公社大楼”吗？

身为出生和成长在宣武区的人，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在孙兴亚老先生的遗作《宣南忆旧》一书中，我找到了一些答案。在这本书中，孙先生写到：“在1958年‘大跃进’的日子里，市里为了再掀城市人民公社的新高潮，为四个城区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各建一所‘公寓式’的样板楼。所谓‘公寓式’的居民楼，从设计上看就是住房是单元

式的，而厨房、厕所是公用的，意味着这种楼房带着‘共产主义’因素。所谓‘公用食堂’，就是不用一家一户的做饭了。东城建在北新桥地区，西城建在福绥境地区，崇文建在广渠门内安化寺地区。唯有宣武区对‘样板楼’经过再三考虑，没有完全照搬。而是‘一拆为三’即建了白纸坊公社一号楼、二号楼（非公寓式）。另在菜园街北头建立了一幢五层公寓”。

孙先生文中描述位于菜园街北头的一幢五层公寓楼，就是现在的菜园街2号楼，位于菜园街北口内的路东。我上中学的时代，在这幢楼的三个单元里，住着一女两男三个同学，因此我对该楼比较熟悉。此楼结实墩厚，房间高大，一层虽是公共食堂，但始终没有派上用场，后改为每层单设一间公用厨房。在那个年代，这幢楼房的质量属于上乘。但从规模上看，显然比其它三个区的“公社大楼”要小得多。这幢楼房处于白纸坊棚户区的改造地段，据说的不拆除，改作他用。

多年前负责过菜市口大街拆迁工作的郑康（他是居住过此楼一女两男同学中的一位男生）告诉我，此楼一门五层居住过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的老师何顺信。大高个的何大叔和蔼可亲的性格，令老邻居们至今难忘。二门二层居住过至今活跃在杂坛的艺术家秦明晓。成长于杂技世家的秦明晓，



菜园街2号楼（原宣武区“公社大楼”）



白广路45号楼（原宣  
武区“公社大楼”）



白广路41号楼（原宣  
武区“公社大楼”）

每天清晨，与五个弟弟在父亲督导下，在楼下空地上练功不辍。此楼一门还居住过著名京剧演员郭新生、李世英，一个武生，一个青衣。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的时候，夫妻俩的女儿在此出生。

那么，孙先生文中提到的另两座“公社大楼”的地点，在原宣武区什么地方呢？根据文中所说的那两幢楼叫“白纸坊公社一号楼、二号楼”，我在白纸坊地区展开了查找。同学郑康再次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这两幢楼有可能在白广路南侧路西的一片楼群中。

因为自小成长在这一带，我对这些旧楼并不陌生，没太费劲就找到了。可“模样”差不多的这片老楼中，哪两座是当年的“白纸坊公社一号楼、二号楼”呢？世事沧桑，轮回已变。过往的匆匆路人和楼群里住的市民，对我的问题连连摇头，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寻找的过程中，在白广路43号楼前，遇到一群正在聊天的老人。看着他们彼此熟悉的程度，能感觉到，他们一定是多年的邻居，楼前空地也是他们经常聚会的“据点儿”。

对于我的问题，其中头戴白帽，年愈85岁高龄的回族老人张大伯，抬手指向不远处的两座旧楼，十分肯定地说：“白广路41号楼、45号楼就是当年

的‘白纸坊公社一号楼、二号楼’”，也就是你要找的“公社大楼”。我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这是两座四层高的楼房，从外表看不出与周围的楼房有什么不同。我问张大伯为何如此清楚，曾在市政设计院下属测绘部门工作一辈子的老人说：“我是看着这两栋楼盖起来的。当时的‘白纸坊公社一号楼’准备建六个单元门，但旁边的一个小教堂不肯搬迁，只好砍掉计划中的两个单元门，成为今天的四个单元门。”我问张大伯：“这两座楼为什么叫‘白纸坊公社一号楼、二号楼’呢？”张大伯说：“1954年成立白纸坊街道，1960年改称白纸坊公社，而这两栋楼是在1961年建成，就被命名为了‘白纸坊公社一号楼、二号楼’。后来白广路两侧建立的居民楼多了，重新编排了顺序号码，这两座楼就被编成了白广路41号楼和45号楼。”

如果细看白广路41号和45号这两幢“公社大楼”，与其它居民楼最明显的不同是：因为首层没有阳台，二层阳台两外角底部被从地面砌起的两根红砖柱子支撑，以防止二层阳台下沉。二层、三层的阳台也是红砖柱子衔接支撑，直至四层阳台外角的底部。

说起这两栋楼的典故，老人们七嘴八舌来了精神。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住过41号楼3单元，当时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任职的李瑞环同志，常到41号楼的张家串门品茗下棋，欣赏张派的名剧名段，两家几十年的交往。居住在45号楼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姜振奎，是金（少山）派传人，中国京剧院主要净行演员，早年与谭富英、杨宝森、李少春、李和曾、叶盛兰等合作演出，在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是饰演胡传魁一角的B角演员。

现在这几座当年建成的“公社大楼”，除了北官厅“公社大楼”前些年被拆除外，福绥境“公社大楼”（据说居民迁出后，改造他用）和安化寺“公社大楼”、菜园街2号楼、白纸坊公社一号楼、二号楼依然健在。看着这些大楼如今布满沧桑的身影，可以想象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它们身影中留下了一段共和国的历史，也留下了一段值得我们记住的回忆。

## 忆自行车存车处往事

□ 原启长

2017年的春天，共享自行车如喷涌一般出现在北京街头主要道路两旁，车站、超市、学校周边随处可见。共享自行车的出现给人们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使黑车没了生意，可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由于乱停乱放，不仅影响交通与行人，甚至有些车被人为破坏，躺在了路边，成了影响城市环境的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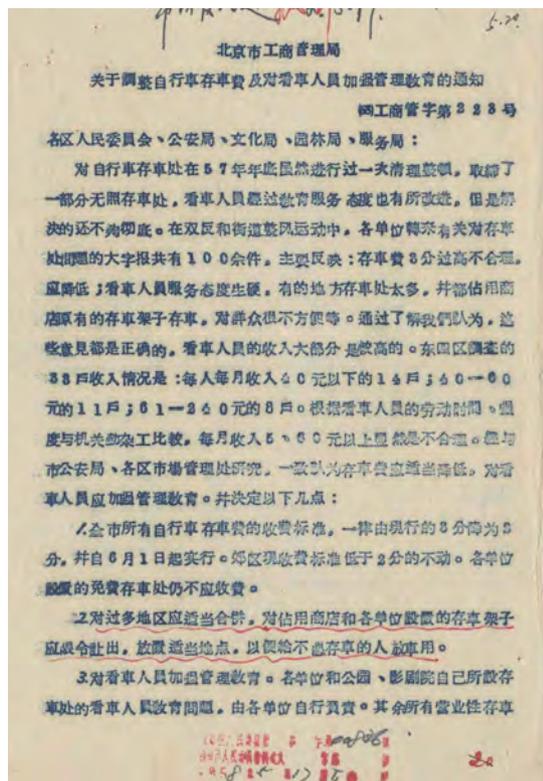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在北京的街头，自行车成为广大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当年，每天上下班时，长安街上那自行车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场面颇为壮观。自行车在当时也算是家庭的“一分子”，家家户户都把它保养得很好，擦得很干净，出门对它也是特别爱护。

那时，北京的公共场所都设有自行车存车处。如西单商场附近的东槐里胡同路北，原是西单商场北场，后来着了把火后就一直空着。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阵子是临时商场，1956年公私合营后成为空地。后来演“飞车走壁”的皮德福和他的马戏团在那呆了一阵子，之后就改成了自行车存车处，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大的一处。印象中，北京动物园存车处在全市也算是比较大的，里面分各个区，按区域存车。体育场有比赛时，会增加临时存车处。提到这些存车处的事，好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全市各大商店门前都有个存车的铁架子，旁边会坐着位大妈或大叔，也有些稍微年轻点的大哥，背着个装存车牌的书包守在一边。存车费2分起价，过时加价，一般最多5分，过夜2角。而且收费都会有小票，夹在车把的正中位置，作为全市统一的报销凭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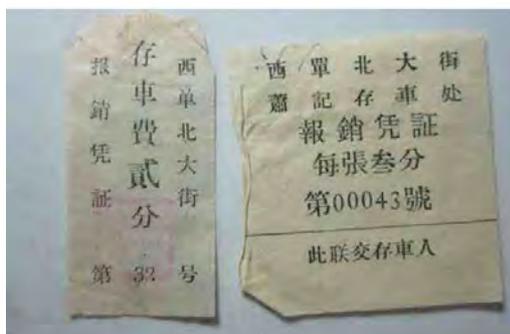
我从小在西单北大街长大，西单闹市就在我家附近。儿时学校一放假，小伙伴就去逛西单旧书店（中国书店），到红光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就势再逛逛商场。从第一商场玩到第三商场，有时口袋里有几分钱，就到西单游艺社二楼听段相声，那时



上世纪80年代前后，北京街头每天上下班时的自行车流



西城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调整自行车存车费及对看车人员加强管理教育的通知》对上世纪50年代末自行车存车费用的记载。



作为存车  
依据的存  
车票



听一段才5分钱。由于老过来过去的，商场前存车处的老大姐、大叔们和我们这帮小孩就都很熟了。因为有几位就是小伙伴的亲友或是邻居，他们的底儿我们这些小伙伴是都知晓的。

首先，存车处的这些大爷大妈、大叔大姐们不是一般人，他们都是过去在社会上混的主。有的是解放前在各大庙会上走会混饭吃、走江湖的艺人。如“大妖怪”，在白塔寺庙会、护国寺庙会上都非常有名，在西城住的老人没有谁不知道的。上世纪50年代许多庙会被取消了，他那套本事自然没地使了，也就变成了社会闲杂人员。还有一些刑满释放回京的人员，以及敌伪时期的侦缉队留用的各色人员，这些人员里面有教授、工程师，还有一些旧职员，很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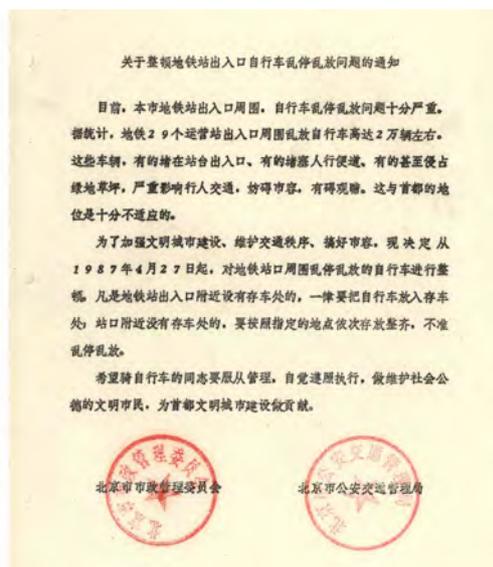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负责管理全市的自行车存车处。通过存车处来安置部分闲杂人员，协助搞好社会治安。过去，偷自行车的贼主要去几个信托自行车商店门口进行销赃，卖给各个大学的新生和一些想置换新车的人。其实，每个信托商店门口都有便衣，和存车处的大妈大叔，还有一些存车处的外勤人员作为眼线，这些无形的网使偷自行



曾经遍布北京街头的自行车存车处

车的贼一般都跑不了。但这些贼也很鬼，他们知道这些地方对他们来说不安全，去了就“折”，所以后来就挑附近的小胡同交易。北京的胡同都串着，穿堂门也较多，这门进去那门就跑了，很难抓住他们。这些偷车贼对胡同非常熟悉，有时故意跑进死胡同，追踪的便衣以为贼无路可逃，可突然看那贼从一根电线杆子上一蹬就上房了，然后就没影了。追的人不明房上情况，只有靠存车处的大叔跑过来从院子里上房才能把贼捉住。诸如这类存车处的大叔们帮便衣提供情况，并上手拿贼的案例很多很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北京街头自行车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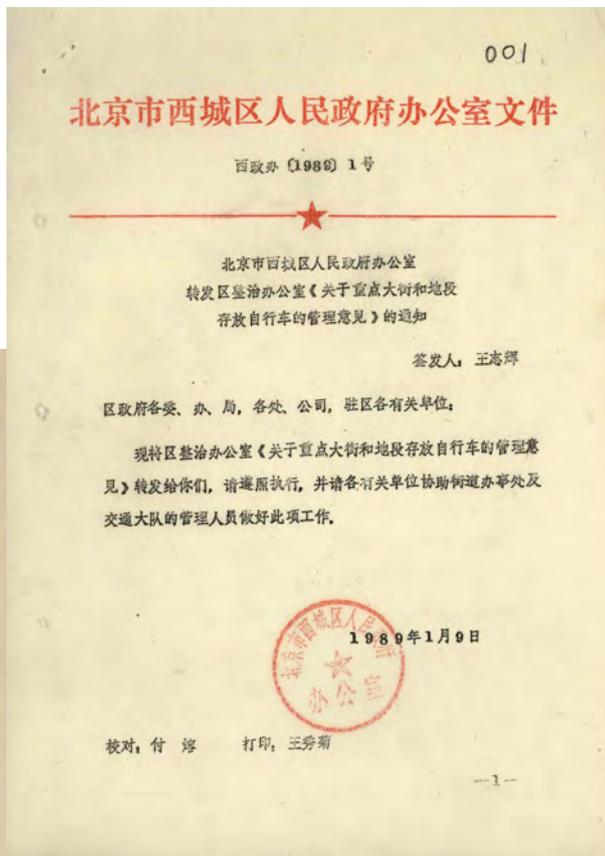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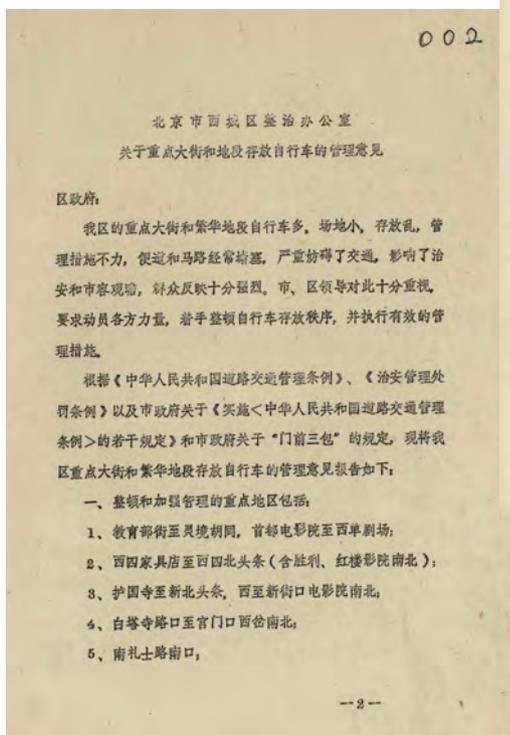
西城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关于整顿地铁站出入口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的通知》

停乱放的问题严重，管理措施不力，导致行人便道和马路经常堵塞，严重妨碍了交通，也影响了治安和市容环境。为此，市、区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首先，1987年4月27日开始，北京市率先整顿了地铁站出入口附近的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紧接着，1989年1月9日，西城区也开展了对重点大街和地段的自行车存放管理整治工作。其中，对重点繁华地段在规划上也逐步安排了存车场地，并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侵占、扩大、撤销存车用地，确保存车用地的使用性质不被改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今天满大街的共享自行车越来越多，其管理问题也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2017年9月15日，《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正式出台，对共享自行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序投放、停放，押金缺少监管，集中停放区车位不足等问题开了“药方”。为保障《指导意见》有效落实，北京还会陆续出台相关配套性文件。我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有效监管，依靠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一定会使共享自行车产生的负面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



上世纪80年代，天安门前一辆辆码放有序的自行车



西城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整治办公室〈关于重点大街和地段停放自行车的管理意见〉的通知》

## 梨园耕耘 锲而不舍

——探访刘嵩崑先生与戏曲结缘的一生

□ 刘嵩崑 / 口述 庞晨 / 整理

口述者简介：

刘嵩崑（1937-2016），北京人，满族。自幼酷爱京剧与文史，业余从事写作20余年，曾用松昆、高山、木公等笔名。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会员、北京市昆曲研习社社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原崇文区作家协会会员、原宣武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京剧》杂志社、《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及《中国演员报》特邀记者。并应约为《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中国音乐节辞典》《名人故居·北京卷》《名人与老房子》《北京文史资料》《中国戏剧》《中国京剧》《中国电视戏曲》《戏曲艺术》《京昆艺术》《西城追忆》《宣南文化》《前门印象》《前门神韵》及《人民政协报》、全国政协《纵横》杂志等近50家报刊、书籍撰写文章。已出版《梨园轶闻》《梨园史缀》等专著。

开头语：

刘嵩崑先生从事戏曲资料收集整理近60年，坚持写作30余年，多次为《西城追忆》供稿，同时结交过戏曲界的众多名家。2016年的初夏，为深入挖掘戏曲文化的历史资料，西城区档案局到刘嵩崑先生家中对其进行了口述档案的采集，为传承和弘扬好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可靠依据。

“少年随父进剧场，青年学演十一郎”

谈起我与戏曲结缘，这得从我打小儿开始说



刘嵩崑先生

起。我啊，从小好戏，也受到前辈的影响。我父亲好，我爷爷也好，因为我们是满族人在旗啊。虽说在旗不许学戏，但我父亲那业余水平唱得也挺好，记不清是在大使馆还是在哪个部

队工作的时候，他有一回不仅唱过戏，还背了一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我不到4岁就进剧场，那会儿还看过梅兰芳的戏呢，见过他本人。基本上是我跟我哥哥，我们俩人从小就受戏曲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受到父辈的影响。从看戏到迷戏，迷戏到学戏，再到演戏，一直到现在写戏。如果没有这些经历，现在写出那么些东西也是不现实的。一般的戏迷培养出来都是从武戏开始的，因为小孩儿不懂戏里的内容，也不会唱，就爱看热闹，尤其是爱看戏台上那些跟头翻得好的，再加上舞台上五花八门的脸谱，就把你吸引住了。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话糙理不糙，道理就是这么个理，踏上戏曲这条路了，再想撤容易吗？不容易。所以说这就是我一个终身的爱好。

谈起我学戏，那得是解放以后的事儿了。记得从解放以后中国的戏校才开始招生，像戏校这班第一届的都是解放以后招生进去的，基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有的比我小一两岁，比我大一两岁的就少了。但那会儿我家里不允许我去学，因为打我爷爷那会儿就不许我父亲学戏，说你看可以，玩儿

可以，但是进戏班儿就是不成。毕竟在过去伶人的社会地位还是很低的，戏子嘛，跟妓女是相提并论的，因此也就没能去考戏校了。

由此来讲，这样的规矩在梨园行来说，也就造成了梨园世家都没出圈儿。祖祖辈辈他们也不乐意跟外界联姻，外界也不想跟他们联姻，造成了“骨肉还家”的现象，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近亲结婚。打个比方，张家的闺女给了李家了，李家的闺女又回到张家，就等于骨肉还家了，这一点不稀奇。有位老先生跟我说过，有的人，进这家，辈儿没法论，今天我进这家，我是爷爷，明儿我到那家，我就是孙子了。最简单的就拿梅葆玖家里的事儿来说吧，这徐兰沅是梅兰芳的琴师，他是梅兰芳大爷的关系。徐兰沅跟梅兰芳的父亲是担儿挑，徐兰沅的弟弟叫徐碧云，是梅兰芳大爷的姑爷，这样跟梅兰芳就平辈儿了，徐兰沅来说呢，比梅兰芳又长一辈儿，梅兰芳管他叫姨夫。他弟弟是他大爷的姑爷，这儿又平辈儿了，等到学艺的时候，要拜梅兰芳为师，又小一辈儿，你说这怎么论的是。所以在梨园界，近亲结婚这事儿一点儿都不稀奇。

### “中年成为梨园客，晚年灯下做文章”

记得头几年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为我颁发“弘扬京昆艺术特殊贡献奖”时，有人给我总结过一句话：“一个布衣门外汉，登顶梨园始料艰，脚踏自行车奔走三十年，寻访陈迹鞋踏破，考证史迹砚磨穿，八十种书报登载百万字，探幽梨园，京师梨园世家，京师梨园故居，京师梨园轶事，京师梨园科班。字字句句可圈可点，京昆的良友，史家的航船。嵩岳昆仑人夫乐山”。这百十来字却真下了功夫，整个概括我的一生，尤其是道出我晚年创作京师梨园三部曲的艰辛过程。

先说说写《京师梨园故居》的经历吧。作为每

个戏曲名家故居所在的胡同儿，我目前所知道就有五百多条，但是我走过的胡同儿又不止这五百多条，甚至这一条胡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是哪。那阵儿去拍一个故居，不是别人跟我说了，这是谁家的故居我就认定是谁的。我得找一个旁证，还得采访，好多人都跟我说是，我这才敢信。接下来，我就得带着相机去拍。但是也不见得说去拍就能拍，正好今天门口乱七八糟的，晒着大被子啊，还有等你转一阵儿变天儿了，都没法拍。等真拍起来也麻烦，我每拍一张片子，我就得记录这是什么胡同，多少门牌多少号是谁住。否则，一洗的时候全是门牌号你知道谁是谁？！毕竟人脑不是电脑，回头洗出照片来赶快每片儿写上：某某胡同门牌多少号，过去多少号，过去这条胡同叫什么，是谁谁谁某年某月在这儿住过。过去梨园故居真正像样的，只有四大名旦家的，那豪华程度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就拿荀慧生的故居来说，现在西城区山西街的那座故居其实是1957年才搬过去的。原先他曾居住在原宣武区椿树上三条路北，那条胡同从北边儿，上二条对着下三条通着的。雕梁画柱，游龙花檐，与尚小云的故居是紧挨着的。建造工艺水平也是相当高，因为那个年代砖是砖，磨浆对缝，那纯粹是米浆灌出来的，所以盖出的房子很坚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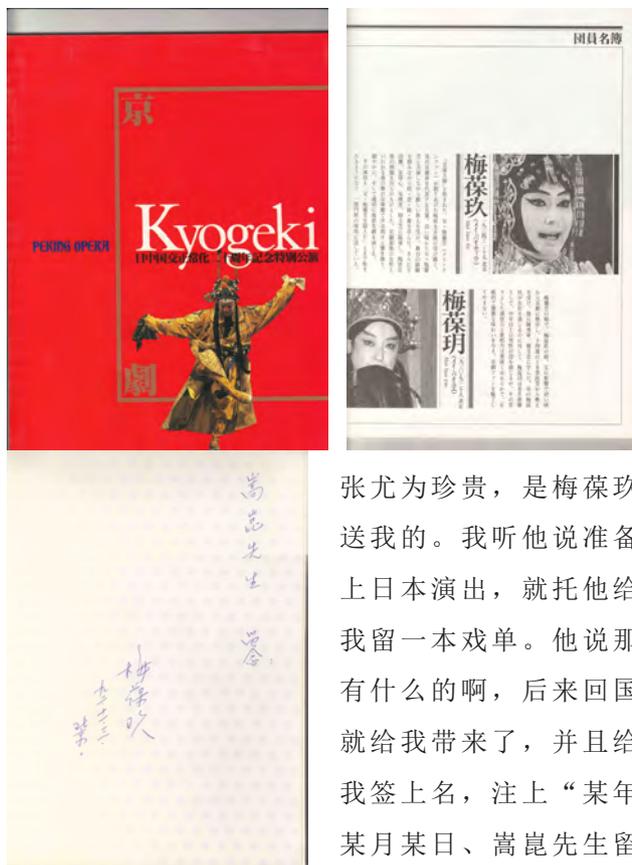
再说写《京师梨园世家谱》背后的一些故事吧。写世家谱我是一家一家的基本上都给落实了，因为它不是编故事，我说您跟谁家和谁家是亲戚，人说不是，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回头不找你打官司啊！不但家谱不能有出入，文字上更得慎重。有些事，采访的老先生虽然说，但你知道就是不能写出来。因为不管任何人，不管干什么行当的、什么地位的，都有正反面。还有写谁不写谁也是一件犯难的事。有的人想载入史册，有的人不希望。后来我确定了个标准，就是写进去的人得是几辈人都从事

梨园行当的，家谱上传下来的才行。另外有人也给我提意见，说您以后再写，该把谁谁家去掉。我说毕竟他祖上是有功绩的，他祖父也好，父亲也好，是有功绩的，该载入史册咱们这里头不能换上个人的恩恩怨怨。我写的各家，他们关系如何，我不介入，毕竟我写的是史料。写史料必须得严谨，可能到最后定稿的时候，我还在修订。因为它这不是故事，是要将梨园界的历史传承下去，以前留下了遗憾挺多，尽量少留遗憾。你要说几百年的事儿，一点儿不差，是不可能的，所以千万别出大笑话儿。作为我本人来考虑，一辈子心血交待在这儿了，不能完了事儿让人找我打官司啊？！

最后再说说我正在修订的《京师梨园轶事》。其实我过去写梨园轶事的文章多了，因此这次出书我想摘出一部分。如果只是把些喜闻乐见的内容搁进去，大伙儿全知道的，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就拿当初写《梨园世家》也是，有人说这家不够档次，我说要是全是梅兰芳、马连良，那就不用我写了，大伙儿全知道。这个人他挑过班儿，虽然说没梅兰芳那么大名气，但是提起全知道。你不写，那将来就谁也不知道了。

### 我的戏曲收藏

我不能一辈子白看戏，也得为戏曲做些贡献。除了写书，我还有些与戏曲有关的收藏，其中戏单就是一部分。过去的戏单主要就是告诉你这是什么戏，故事情节是什么，主演是谁，戏单设计得跟有的小书签似的。这些戏单我都会分类，一张纸一张纸地对着灯，一点一点儿拿小浆糊粘上，边儿不齐的我画出线来用刀裁齐了，最后装订成书，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翻翻，也算自己个儿过了遍戏瘾。我收藏的戏单除了自己保存的，还有别人给我的，这戏单要是摞起来比一个人还高。这些戏单当中有一



梅葆玖赠送给刘嵩崑先生的日本演出戏单

张尤为珍贵，是梅葆玖送我的。我听他说准备上日本演出，就托他给我留一本戏单。他说那有什么的啊，后来回国就给我带来了，并且给我签上名，注上“某年某月某日、嵩崑先生留念”。有时候看我收集的这些戏单，琢磨怎么

自己天天看戏啊，后来细琢磨也难怪，那阵儿我要出差到外地，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今天有什么戏，因此我的戏单也就这样越攒越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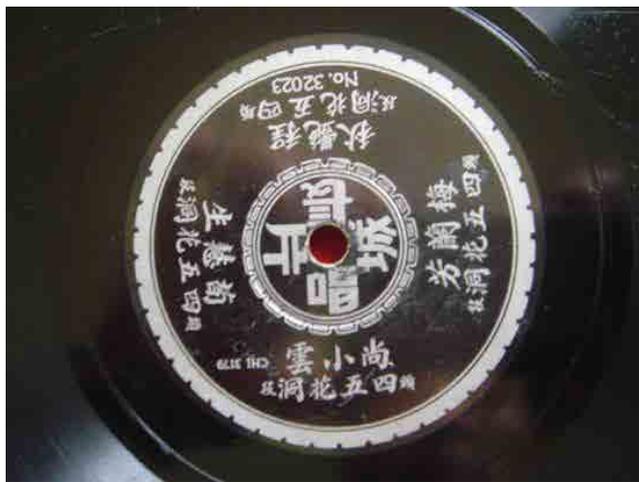


刘嵩崑先生收藏的戏票

我的另一件收藏就是我的戏曲老唱片。我家里有个唱片柜，里面放着的是我这一辈子慢慢攒下来的老唱片。有些解放以后灌制的老唱片对我来说特别珍贵，“文革”时期破四旧，为了保护好这些老唱片还有收藏的戏单，我就把它们转移到住农村的姨家里去。因为农村有地窖嘛，搁地窖保存着还是比较保险的。这也还得感谢我姨，她不时地拿出来擦一擦，怕给我弄坏了，所以才保存到现在。包括四大名旦唱的那出《五花洞》的唱片我也有，灌制的过程、说明，我都保存着呢，能留到今天真的很不易。

要说我收藏中最珍贵的，可以算是我那把有着众多戏曲名家签名的扇子了。为什么珍贵呢，原因在于上面签名的人起码照着五分之三强点儿都作古了。因为我个人兴趣广泛，不只京剧，什么戏我都看，只要是名家，我这扇子上都有。走的人我都要把他们的名字划上方格，吴素秋刚画完，这两天梅葆玖走了，又该划葆玖了。前两天李世济也走了，我又该把李世济画上了。看着这些带着方格的名字，我的心里十分感伤。

看着满屋子的这些藏品我也犯愁，将来怎么把它们留存下去呢？有一回梅葆玖跟我说：“你这个事甭发愁，到时候国家就找你了，就是说肯定会有人找你。”他说他父亲梅兰芳的东西也是全捐给国家了，梅兰芳的那些东西是他夫人，也就是梅葆玖的母亲全部捐给国家的。他说，不捐给国家，如果他们的后代一点点儿给卖了就散落了，你卖得钱再多也不行。像梅葆玖说的那句话：“我妈做这个事，太高了！”



四大名旦仅有的一次合灌唱片《五花洞》



刘嵩崑先生收藏的富连成部分学艺者签名扇

### 结束语：

2016年12月27日晚，刘嵩崑先生外出看戏回家途中突然离世。噩耗来得太过突然，28日我局得到消息，深感震惊和遗憾。上次在他家中做口述档案的采集时，他还跟我们说梅葆玖先生走的突然，又说今年梨园界走的人太多了，没想到他也走了……只能祈祷刘先生在另一个天堂能继续爱戏、入戏……他去世前完成的著作《满目繁华·京师梨园百年》系列图书已于2017年出版发行，并在去年“国际档案日”（6月9日）当天由燕山出版社按照刘老的遗愿将这部著作捐赠给西城区档案馆。谨以此文悼念“爱戏如命”的“梨园史官”刘嵩崑先生。

# 我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的日子（一）

□ 王民培

从1950年6、7月至1955年7月，我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整整五年。那些难忘的时光夯实了我人生的根基。

## 一、美丽的校园先农坛

北京育才小学的校园竟然是先农坛！它和天坛在中轴线一东一西，隔路对称遥遥相望。这里曾经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耕籍大典”的地方。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如今，育才学校虽然仍在先农坛里，但因为文物保护的需要，里面的古建筑群已经划改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从而修葺一新。另外还有其他的单位也占用着，而育才早已由小学变成了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在内的教育机构。我们在校期间，全校充其量也就是两千多人，现在先农坛里不知挤着多少人啦。

早先，我们从北门进去，一条路直通向南。路东一片丁香树林，路西也是丁香树林，只是更大，树下全铺着石子。春天丁香花开时节，花气袭人，香飘满园。白色、紫色的丁香花，一丛丛一簇簇争奇斗艳。那时课间，我们时常在丁香树林里玩，欣赏美丽馨香的十字花，呼吸那沁人心脾的花香。

路的两边有小柏树连成的绿“墙”。校园里有多好多参天古柏，粗大的树身，要几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那些古柏，和中山公园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古柏一样，雄健苍翠，这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古树。有一次为了写作文，我曾经去问老师：我们学



入学时的王民培



学校校徽

校共有多少棵树？老师说有600多棵！我不知道，如今它们还安好么？

校园那时虽然也是红墙碧瓦，但由于年代久远，已显得斑驳破败。不像今天，修葺一新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雕龙画凤，金碧辉煌。那时校园处处都有待修缮，宿舍里经常有老鼠窜来窜去，不时咬坏我们的衣物。

沿着那条南北直通的路往南走，右边是先农坛里最大的古建筑群，由东向西排开，现在按明清时的称呼叫“太岁殿”“神厨院”“宰牲亭”。我们上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称呼的，只是简称“二院”“三院”“四院”。这三个院子都曾设为学生的宿舍，我在三个院子里都住过。“二院”的太岁殿最雄伟辉煌，大殿顶上是绿色的琉璃瓦，下面是红的门、雕花镂空的窗，下面是大理石的台基和台阶。我们在校时这作为大礼堂用，只是最东边被学校从里边给隔开一小部分，辟为学生的一处饭厅。这个“太岁殿”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石阶下边自西向东摆放着四个奇大无比的铜缸。真的很大，容



学校大门

得下我们五六个同学一起爬到里面去玩。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到过铜缸，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的照片里也可见铜缸，但我总觉得没有先农坛的大，也许是那时我们太小的缘故。大铜缸文革后不见了，听有人说是被毁掉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太岁殿院子里的南房古时叫“拜殿”，我们在校时也用作饭厅。太岁殿是坐北朝南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厢房11间，我们在校时都作为学生宿舍。我在西厢房住宿时，枕头被老鼠咬破了，它们是饿急了，拿里面的荞麦皮来充饥。而住在东厢房的时候，记得是1951年7月1日，我们曾挤在窗口往外看，争着看毛主席路过我校去先农坛体育场开大会。

沿路再往南走，可以看见一处有高台阶的建

筑，匾额上书写着“诵幽堂”三个字。听说明清时叫“俱服殿”，是皇帝更衣休息之所。我们上学的时候用作图书馆，我在那里读过好多好书，有《刘胡兰小传》《铁娃娃》《把一切献给党》《七个小英雄抓特务》《我们的土壤妈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许多少年儿童杂志。这些书籍不仅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也将革命传统、文学修养“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我们小学的毕业照，就是在“诵幽堂”前台阶留下的。对着照片，我至今仍叫出上面每个同学和老师名字。

“诵幽堂”往前，是一个很大很精美的台子，叫做“观耕台”，是典型的宫殿坛基式建筑，其东南西各设九级台阶。观耕台用汉白玉和琉璃砖建造的，四周有汉白玉的雕栏，台子外围及台阶的迎



同班同学甘璧文在观耕台背面的照片

面，都雕着缠枝莲花，十分精美，和传统古建的图案相似。我们老师曾经把这图案临摹下来，让同学们把图案绣在一块大桌布上，作为学生作品，拿到国外上参展，还曾经获了奖，为学校也为国家争了光！多年过去了，我和蔡晓晴（著名的国家一级导演）聊起这件事，她也还记得，她那时就在五班读书，我在六班。几十年的老同学了，许多事还记忆犹新。每次见面，说起母校总是有无尽的话题。

观耕台是皇帝举行“耕籍大典”时，站在上面观看大家耕地的地方。故名“观耕台”。它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是皇上的“一亩三分地”。据说，皇上不但站在观耕台上观耕，在隆重的仪式开始时，也会下到地里去摸一摸犁把，算是参与了耕种仪式。小时候听说，他扶的那犁把是金子的，上面还缠着红绸子，显示着隆重和喜庆。娃娃家只是听说，不知真假，那是小时候的故事。影视片里也另有一番描画。

我们上学时经常到观耕台上去玩，有时举行少先队的活动，有时是练唱歌跳舞。观耕台南面皇上的那“一亩三分地”，那时用做小操场，记得我们曾在那里击打垒球。

学校课堂是后来新建的，红瓦平房。前后两排，多个教室，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再往后走到南墙，那有一个高大的拱形门，门上书写“零坛”二字。穿门而进，里面好大，真是别有洞天。那么多参天古松，默默站立，向上斜伸着枝桠，姿态奇崛，像一些古稀老人，冷眼人生。

据说零坛是古代求雨的地方。这倒是挺配套，先农坛种地，零坛里乞雨，但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零坛里两边各有一个大石台子，大概是举行求雨仪式的地方，但显然已不完整了，石头是东倒西歪的。这种纷乱格局，正好是我们玩捉迷藏的好去处。零坛里边，在我们入校以后盖了些现代楼房，当时只有三层楼高，现在就挤得不成样子了。

## 二、学校就是家，老师像爹妈

育才小学的根本是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些老师、阿姨、炊事员、工友便是来自延安或者其它老革命根据地。他们勤劳、质朴，政治觉悟很高、工作尽心尽力。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在无形中作了示范。

我是1950年2月底（或3月初）从太行山老区来到北京的。办好了手续进育才小学上学，已是6月下旬或7月初了。那时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父亲却偏偏让我此时入学，理由是让我在正式上课前先熟悉环境、适应寄宿制的集体生活。我那时刚刚8岁，乍离故乡和父母，很不习惯。经常想家，哭鼻子。甚至半夜偷着爬起来到教导处给爸爸打电话，让他来接我。班主任老师李耀堃特别慈祥，见我那么小就离开家乡离开爹妈，很理解我。我想家哭了，她就给我擦眼泪擦鼻涕，讲笑话哄我。还常常给我讲故事。李老师那时年纪已



入校后接触到的第一位老师李耀堃

经不轻，而且她的两只脚是解放初叫做“解放脚”的。就是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放开了，但无法放彻底，所以走路仍走不了太快。常常是她撇着那两只“解放脚”拉着我的小手到图书馆看小人书，到观耕台四周看花，到喷水池看鱼，到学校的小小动物园看兔子、虎皮鹦鹉。特别是看到那只调皮的小猴子自己戴上个破钢盔，拎着个破水壶去打水时，逗得我和大家哈哈大笑。因为水壶是漏的，所以小猴子总也打不来水，太好玩了。天气热时，李老师自己掏钱给我买西瓜吃，可亲了。有的时候李老师忙，就让其他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带我玩。他们带我去丁香林捡小花石头子，到草地逮蚂蚱和螳螂，十分有趣。很快我就作为集体的一员和大家融在一起了。

虽然是暑假期间，但是仍有一些学生留在学校

里，他们没有家，学校就是家。其中有的人小学毕业了好几年，周末假日仍回育才这个家里来。同学的父母中，有的已经牺牲；有的随大部队南下，去解放海南岛和大西南；有的被敌人逮捕后没有消息；有的失去联系找不到了……

我们班有个王姓男同学，直到三四年级时才找到父母。下一年级有个李姓女同学，到了四五年的时候父母才来认领她。刚刚认她还处在惊喜之中，却又听说她还有个妹妹。“父母”惊讶地说，哎呀，认错了，我们只有一个女儿。毕竟战争把父母和孩子分开太久，彼此竟是那么生疏。那对“父母”失望地走了，而我们那个同学，别提有多失落了！

后来，经一个延安时就在校的阿姨证明，那个同学的所谓妹妹虽然也姓李，但并不是她的亲妹妹，而是行军路上，阿姨让孩子互相关照。把另一个女孩交给她，顺口叮嘱她说：这是你的小妹妹，你要好好照顾她。她很认真，就一直照顾这个小同学。久而久之，感情深了，她自己和别人都以为是亲姐妹了。后来，这个同学的父母再次来到学校，同时认领了这两个女儿回家。这段故事令多少人潸然泪下。

我们年级一个杨姓女生，父亲被反动派关押在重庆渣滓洞，就像《红岩》那本书里写的一样，开国大典时他们知道了；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他们也知道了。但是，他们却在黎明前被残忍地杀害了。育才现在仍保留着一份国家一级文物——一个登记册，上面记着烈士遗孤和父母失联的同学的姓名和基本情况。项学诚的名字跃然纸上。项学诚是项英的儿子，项英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早在1928年即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是中共核心领导之

一。1941年，作为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所以，项学诚在育才的时候就没有家。那本册子上填写着他是烈士遗孤，其临时监护人为李富春和蔡畅。但这两位领导当时因战争和工作的需要，奉命去了东北，学校一直联系不上。项学诚还有一个姐姐，叫项苏云，她是育才延安时期的老校友。她的一生中，只和父亲项英在一起呆过12天！那还是因为项英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她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父辈抛家离子投身革命，父母儿女骨肉离散，还不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这样的例子学校还有不少，这些同学以学校为家。但他们在学校里的表现并不消沉，反而总是乐观向上。且比别人更显成熟、自立能力更强、更加有进取心。

他们和大家在一起，天天一起唱歌，饭前要唱，晚点名时唱，活动时也要唱。歌唱共产党，歌唱新中国，歌唱优良的好传统，有时唱得人声鼎沸。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唱悠扬的陕北民歌。比如“放羊”一曲，我至今还能哼唱出来：“清早起，担干粮，出门去放羊。心里喜来嘴里唱，要把那羊儿好好地放。山坡上，草儿青，羊儿吃草笑咩咩；小河里，口渴了，羊儿喝水不带犍，大羊小羊黑羊白羊，一只两只七只八只，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哎，羊儿吃饱了，哎，羊儿喝够了，今天的太阳下山了，赶着羊儿回家了”。那歌词中，充满了劳动的喜悦之情。还有“卖菜”：“芹菜、白菜、水萝卜菜儿吆，挑着担子去乡村……”。其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很能感染我们。

在这样的集体中，学校就是家，老师阿姨像爹

妈：给我们讲革命的道理，讲做人的规矩，集体生活的准则，培养良好习惯。晚上阿姨帮我们掖好被子，早上呼唤我们按时起床，比赛谁的动作最快，谁被子叠得最整齐，谁出操最认真。我们班蔓新新年龄小，动作跟不上，阿姨会一边说：“蔓新呀，蔓新，你可真慢，得跟上大家。”一边手脚麻利地帮她穿上衣服。衣服破了，缝补班的大妈给我们补。我们四年级的时候，阿姨在“二院”的地上铺好席子，教我们自己缝被子。培养劳动习惯，学会自理生活。同学们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几个月后，当爸爸妈妈周六下午接我回家时，我反而舍不得离开学校了，并且给他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

“学校就是我们的家，老师待咱们像爹妈，同学们团结友爱互助好，你帮我来我帮他，大家努力学文化。”

### 三、传统教育铸灵魂

学校特别注重革命传统教育。晚点名时，领导和老师就讲话，表扬同学中的好人好事，批评还存在的问题。记得李志平主任头戴蓝棉帽，讲话时最喜欢把两只手倒背在身后，还两手揣在棉袄的袖里。他给我们讲的大道理其实都是通过小故事讲的，记得他讲我们学校的师生在离开延安一路行军的过程中，过河时怎样互相帮助：大个子男生背着年幼的同学，男生帮小女生拿东西，年龄大的女生搀扶着体弱的老师，大家拉着手避免摔倒，一起蹚过冰冷的河水……这点点滴滴的小故事都渗透到了我们小小的心灵。

记得一二年级时，下午常有“阅读”课。届时老师会抱着一个大木箱子来，那箱子上写着“巡回箱”，里面装着许多小人书。开始时老师总是给我

们讲小故事。记得她给我们讲过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妇女，愁眉苦脸地抱着一个病孩子。毛主席十分关切，亲自下车去询问，得知孩子病得厉害，又没钱治，眼看已奄奄一息。毛主席赶忙让这母子坐到他的车子里，派人带他们去看病。后来这孩子得救了。全村、全家都感谢毛主席。为了永久地纪念，这孩子本来姓郑，就干脆改名叫“郑泽东”了。

老师讲的故事可多了，还有放牛娃王二小的故事、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还有鸡毛信的故事等等。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自己看巡回箱里的小人书。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还可以同学间互相讨论。在活泼自由的氛围中汲取精神营养，增长知识。下一次阅读课，就换来另一个内容不同的巡回箱了。我们如饥似渴地读着那些书。里面也有外国的故事书，比如《白雪公主的故事》，记得还有一本书叫《小狗卡施坦卡的故事》，我不认识那个“施”字，念成了“拖”，老师就给我纠正。

学校经常请英雄模范和我们见面，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记得中国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人民的花木兰郭俊卿都来过。旧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都是男尊女卑，见到她们，听到她们了不起的事迹，我深深体会到新社会里男女平等了！以前只有男人能干的事，现在女人也能干了！而且干得相当出色！这是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巨变。连我这个小女孩儿也深

感自豪。

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老英雄孟泰也给我们做过报告。他带领工人们日以继夜地恢复旧鞍钢厂，积极为祖国



同班同学，从前到后为曹红桃、苏安安、艾延林

大炼钢铁的事迹令人敬佩。新中国是人民的天下，工人阶级从解放前的受苦人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翁！我们还听过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战士的报告。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根本没有水喝，他们甚至喝自己的尿。最后连尿都尿不出了。但他们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新奇迹。这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着亿万人民。我下决心向英雄们学习。

上世纪50年代，社会风气特别好，育才的风气也特别好。对于干部子弟，党和国家最希望他们像父辈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冲锋陷阵，不惜流血牺牲。建设时期能为国家的富强，不怕苦，不怕难，永攀高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担心他们的是在和平时期蜕化变质，成为新社会的少爷小



1997年校庆返校时五五届近百名同学在二院(太岁殿前)合影

姐，成为八旗子弟。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反复强调了多少次！那时，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而育才的学生又主要是政务院系统的子弟。因此更是身体力行总理的教导。在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等方面做得较好。一旦发现问题，就批评教育，及时给予纠正。

学校的老师和领导经常用党的光荣传统教育我们，不许学生之间攀比家长的级别、职务，而是要比学习好，比品质高。那会儿没有比吃喝、比穿戴、比钱多的。因为供给制条件下，大家吃得都差

不多：馒头都馒头，窝头都窝头。豆浆都豆浆，稀饭都稀饭。穿的衣服是，冬天黑棉衣棉裤，春秋是蓝色制服，夏天女生是白衬衫黑裙子，男生是白衬衫蓝裤子。高年级的时候女生才有了花衬衫。我们的衣服常常都打着补丁。记得我们班同学曹红桃和她哥哥，裤子的膝盖上老是补丁。尤其她哥哥曹建南，那会儿又喜欢运动，长个子又威猛，除了膝盖打补丁，裤脚老要接一圈，一圈圈接下去，就像梯田似的。谁也不会想到，他爸爸就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他为人民管

着全国的钱，儿女却是那么朴素。那时的家长们也都没什么钱，供给制嘛。我们党在战争时期讲的就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建国初期讲的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种风气真好！有个同学的家里周末开小轿车来接他回家，其他同学就给他家长写信，提出批评。此事我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详细写过，这是真实的故事，被批评的可是有名的大干部哟。而年纪轻轻的小学生，也继承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在学校的培养教育下，我渐渐地懂事了，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深深地体会到，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把我们从三座大山下解救了出来。我们家原来那么穷，生活那么苦。而且，日本鬼子频繁地到我们老家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家炸成废墟，杀戮了我们那么多乡亲。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正是懂得了这么多道理后，才发生了下面这个有趣的小故事。

#### 四、我和奶奶“闹翻了”

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亲人之间怎么会闹翻了昵？

我们家的情况是：爸爸不到18岁就参加了革命，打了8年的抗日战争、3年的解放战争，1949年春进北京，分配到中央教育部工作。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参加志愿军去抗美援朝，一去又是3年。我妈妈在太行山老区就是妇救会委员，带领

妇女纺棉花、织布、做军鞋送到前线给八路军穿。大生产运动中，妈妈还是县里的劳动模范呢！奶奶也不错，抗美援朝初期，她就和几个乡亲组织起了互助组，在集上卖饭，收入的钱都捐给抗美援朝。为此，她的照片和事迹还登上了报纸。

1950年初经组织批准，我来到北京进“育才小学”读书，过上了供给制的寄宿制集体生活。后来，我妈妈和奶奶也来到北京，住进机关大院。记得1951年寒假时，我从学校回到家，和奶奶妈妈一起。那时的晚饭后，别说还没有电视，就连收音机也没有。我还不到10岁，喜欢看小人书，听妈妈讲故事，在桌子上抓羊拐玩。冬天天短，早早地就上床了。躺在床上，左边是妈妈，右边是奶奶，感觉温馨又幸福。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躺着聊天。奶奶问我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我说，学校可好了，老师、阿姨待我们像亲人。又告诉她我们发了什么衣服，吃的什么饭菜，医生有没有给我们打预防针等等。奶奶啧啧地感叹着，说你们太幸福了。我说，就是，太幸福了！奶奶又说，吃水不能忘了打井人，乘凉不能忘了栽树人。我说，当然不能忘。这不是聊得挺好嘛！谁知奶奶的理解与我的完全不同。她说，没有你爸爸，能有我吗？没有奶奶，能有你爸爸吗？归根结底，奶奶就是那打井的，种树的，你的福气是奶奶给你带来的，可不能忘了奶奶的恩呀！我一听，腾地就坐起来了。说：奶奶错了，我们书上写的是，吃水不忘打井人，时

刻想念毛主席。我们唱的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奶奶高声道，光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没有你奶奶和你爸爸，你在哪儿呢！我也火了，用更高的声音说：没有共产党，您还吃糠咽菜呢！没有共产党，日本鬼子早把咱们杀光了。奶奶也坐起来了，吵架似地说：你对，你对，那为什么放了假回到奶奶这儿来？为什么你来吃奶奶做的饭菜？你放假回共产党那儿去呀，你去吃共产党做的饭呀！我站在床上嚷：对对对，我这就去找共产党！说完跳下床，找着我那块包袱皮（那时候没有提包、箱子，每个同学就一块包袱皮，用来包日常穿的几件衣服），就要包起我的衣服出门。在这个过程中，我妈妈干吗呢？妈妈白天工作太忙了，躺到床上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听着我和奶奶聊天。听到我们俩呛呛起来时，她就在被子里拿手捅我，递个眼色给我，让我少说几句。可我没听。此时看到我居然要冲出门去，赶忙下床拦我。我哭着说：谁也别拦我，我现在就去找共产党，去吃共产党做的饭。奶奶在床上喊：别拦她，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让她走！我冲出门去了，妈妈在后面紧追不舍，硬拉我到邻居边阿姨家去。在那里，她和边阿姨一起解劝我半天。我气哼哼地问妈妈：我和奶奶谁对？妈妈说，当然是我女儿对了。我这才破涕为笑，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批评奶奶？妈妈说：我女儿讲的是大道理，你奶奶讲的是个人的小道理。可是，你奶奶年纪大了，



1951年，笔者加入了少先队

好多道理相信她慢慢会明白的。

又过了一年多，抗美援朝结束，爸爸终于回到北京。妈妈和他聊天时，说起我和奶奶闹翻的故事，爸爸听了哈哈大笑，称赞道：好女儿，懂大道理！

## 五、1951年“五一”节前我戴上了红领巾

少先队成立初期，入队条件还挺严格的！除了要学习好，各方面表现好以外，而且年龄要满9周岁。我那时学习挺好的，表现也不错，就是不够规定年龄。

中國少年兒童隊隊員表			
宣區育隊部		第 1951年4月30	
姓名	王昆	性別	女
籍貫	山西黎城縣	年齡	9
家庭住址	北京西單達智智13		
家長姓名	張培	家長職業	高級郵政科
入隊時間	1951年4月30日	入隊地點	北京育小學
編隊	育大隊六中隊二小隊		
曾任隊內何種職務			
隊部意見			
備註			

筆者加入少先隊時的隊員表

老师怕我有急躁情绪，就经常鼓励我，让我学习少先队的知识，首先打好基础，先具备了队员的条件，一到年龄，准能入队。于是，我就把少先队的知识背得滚瓜烂熟：少先队的队旗是鲜艳的红色，它象征着我们的队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队旗中间的星星火炬，象征着少先队员们紧跟共产党，高举火炬向前进！而红领巾就是红旗的一角，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就要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敬队礼的时候，要五指并拢，高举过头。五指代表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并拢表示团结一致。高举过头表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老师见我学会了，又进一步要求我付诸实践。从一点一滴做起。终于，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打造成功了。1951年4月，我年满9周岁，学校批准我入队了。站在礼堂的台上，辅导

员给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先是举手过头顶敬着队礼，然后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这一切，虽恍如隔世，却记忆犹新。

说起我的入队，还有两个有趣的小故事。老师告诉我，因为“五一”劳动节全国放假，所以你的入队仪式是在4月30日举行。我脱口而出：“要是‘五一’就更有意义了。”老师笑着说：“你想填表写‘五一’吗？”我说，应该诚实，哪天就是哪天。此后我一直填4月30日入队，我记住了这天是4月的最后一天。直到我后来加入共青团的时候，竟然在填表时把入队时间写成了4月31日，4月的最后一天嘛。团委书记笑着问我，4月有31日吗？

还有，4月29日那天下午，该我们组值日，打扫教室卫生。但值日时却只有女生在干活，男生都不知跑哪儿去了。太可气了。有人就发牢骚，我没有，因为我马上就要入队了，要爱劳动。到快打扫完教室时，那几个调皮的男生才回来，一人手里举着一枝乳白色的洋槐花，那花朵香喷喷、甜丝丝好诱人！他们也不提值日的事，只是兴冲冲地把花递给我们说：快吃吧，可好吃了！我们女生也忘了批评他们，只顾吃起了槐花。他们还不停地问：好吃吧？好吃是好吃，就是太少了。于是他们又建议大家一起去再采。我们一窝蜂地跑到校园去，男同学哧溜哧溜地爬上树，在上面折枝，女生在下面仰着脸接他们仍下来的槐花。正在兴头上，只听一声大喊：“干什么呢，下来！”天呐！教导主任来了！我们站成一排，让他结结实实地批评了一顿。他还特别提到，少先队员要爱护公共财产的那一条！这一句，把我吓得够呛。当夜，我这个9岁的少年失眠了，哭了。翻来复去地想，明天，还能让我加入少先队吗？（未完待续）

## 李友新先生的执教生涯（一）

□ 李明德

每年教师节来临之际，我都会想起祖父李友新。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他是一名执教近半个世纪的数学老师，他热爱自己的教育工作，他的学生遍布京城，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这里，我要认真回忆，如实地记述祖父的数十年如一日执教生涯中感人的片段。

李友新先生，16岁时考入顺天高等学堂，这是清末皇家办的最高学府，在这里他专攻代数、几何。他聪明好学，身体也很强健，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与同学王月楼很要好。还有一位同班学友是位北京远郊顺义县富户子弟，名叫申为农，这位学友性格直爽，学习要强。三人在班上功课都好，平时又谈得来，在将毕业那年，三人省吃俭用，各买了一辆风头自行车。每逢周末，带上干粮和水，去近郊或城内的景点游玩，他们曾去过颐和园、八大处及通县、顺义、卢沟桥等地方游玩。这在当时是很令人震惊的。原因就是那时城里很少能见到自行车，三位青年骑着车这么一路兜风，可谓是时髦一景啊！李友新在顺天高等学堂毕业时，已经22岁了，他成了当时清末第一届皇家大学的毕业生，全家和亲朋好友都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年秋季，由父母作主，他与尤氏女子结婚。转年生下女儿玉秀，第三年生下个男孩，取名永元。清末大学堂不安排学生差事，李友新成家得子，日子过得很快。有父亲李实臣掌家，又有些积蓄，日子过得还算快活。

就在儿子永元降生这年夏天。学友申为农派人

给李友新送来一封信，信中写到：见信如面，同学一别近二年，甚为惦念。信中谈到毕业回到顺义县，在这里的牛栏山有座元盛宫，庙空僧散。为修座大寺院里他正筹资修缮，想实现自己在家乡办学的愿望。为培养农家子弟，成立中学，定名为牛栏山中学，自任校长。他在信中写到：“眼下急需教师，尤其数、理、化方面的教师。待遇从优，首先想到老兄，你是最理想的代数、几何教员。望兄能帮助老同学完成办学之宏愿，急待回音。”李友新读罢为之所动。想到身为皇家学府培养，理应为培养人才而效力。何况如今农家子弟急待求学，情况比北平市内更迫切，老同学全力投身于教育，成立中学，其功德无量啊！应该支持他才对。那些日子，李友新心中很难平静，他心系远郊的农家子弟。他曾想与尤氏谈及此事，几次欲言又止。因孩子年龄尚小，正需要悉心的照料，自己如果去任教，妻子就少了个好帮手。

转眼又过去半个月，正值八月盛暑，这日将近正午时候，门外有人扣门。李友新忙前去开门。门启开时，一声“友新”的叫声是如此的熟悉。李友新抬头观看，来者正是老同学申为农。李友新叫着他的外号：“胖子，我太想你了！”拉着申为农的手进了院。胖子一身农民打扮，头上还顶着草帽，不时用毛巾擦着汗。在西房落坐，尤氏送上扇子和茶水。正在坑上玩耍的两个孩子，直愣愣地看着这位胖叔叔。学友相聚，有说不完的话。尤氏下

厨，炸酱手擀面条，一盘子摊鸡蛋，李友新又拿来了二锅头酒，哥俩举杯痛饮。席间为农又将心事提出：“友新兄弟，此行来京，专门是为请你出山，九月初我校就要开学了，学生近二百人，均为农家子弟。你如能答应任教，我可在京城多住几日，为校里购些教具。”转身又向尤氏深施大礼，“嫂子，大哥如能到我校任教，那给您添了很多麻烦，小弟这厢再行一礼。”胖子这番盛情，使李友新一家很感动。尤氏说道：“兄弟，友新长了这么大，也没出过远门呀。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照应，我倒也放下了心。”申为农闻听此言，拍着有新的肩膀，忙说：“嫂子都答应了，大哥你就帮兄弟一把吧！”于是酒足饭饱之后，二人一起商订了牛栏山中学办学宗旨，以及具体课程安排。李友新任代数、几何教师。数日以后，申校长在京购买了教具，李友新整好行装，尤氏为他装备衣物。然后雇了两辆人力车，把他们拉到东直门外。后乘骡车奔顺义，午后赶到牛栏山中学。

这里是有着四进殿宇的古庙，过去是元代元圣宫。古刹前有一对古老石狮，院内松柏参天，可谓读书的好环境。院内配殿均改为教室，后院是校长室及师生宿舍。开学前校务会由申校长主持，因为师资力量尚欠，决定向天津、大名府等地去求贤。陆续请到教化学的吕先生和教古文的唐先生等4位。加上顺义本地教师，总计有教师12位，工友厨师4人。各科课程表排齐后，9月1日如期开学。学生主要是顺义本地的。家远的在校内入伙、住宿，也有不少学生自带干粮走读。李友新认真备课上课，课下回到宿舍，要给学生的作业打分。闲下来就去集上走一走，日子过得很快，有时托人给家里带封



李友新父子在顺义牛栏山中学的合影

信。报个平安而已。每到开饭时，住校老师都在一桌，主食多为面食，吃米饭的次数很少。这里有位天津来的吕先生，是位南方人，最爱吃米饭，几顿面食下来使他面带难色。这一天，厨子端上热水饺，大家倒醋又包蒜，吃得非常香。吕老师却在一边犯愁，拿着筷子发愣。大家都看在眼里，饭后回到宿舍，李友新打开墨盒，拿起笔摊开本，写下打油诗一首：“饺子上来热腾腾，吕老师又把怒气冲，有心要把厨师叫，何不把干饭蒸……”，在这个本子上，李友新记下了学校生活，农村民俗，农忙时节等诗词多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个春秋便倏忽而过，每年寒暑假，李友新从牛栏山返京，带好一学期的薪金（银元），装上当地的土特产，带给城里家人。有时寒假回京时，还不忘出去游走。比如去赵县看著名的赵州桥，采

购当地特产雪梨，每个梨半斤多重，提携着大包背到家。假期间，常与老父亲李实臣叙谈，父子团聚聊天的话题很广泛。讲京城的时政、民情；谈农村的生活、风俗。李友新拿出闲时所作小诗读给父亲听，老人边听边修饰文字，他对儿子投身教育，为农民子弟培养人材的作为甚是赞赏。尤氏对丈夫自食其力，教书挣钱养家更是高兴。依靠着李友新执教的薪金，全家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倒也平和顺畅。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老百姓平静的生活。整个华北平原被日寇所侵占，人民群众满腔愤怒，与侵略者进行斗争。牛栏山中学申校长身临困境，日本兵在汉奸的指引下，强行在校内住军。初中六个班的同学没有了教室，校长被迫宣布停课，不得已师生们洒泪离校。那天晚上李友新正在收拾东西，看着学生们的作业本，心里一阵难过。正在此时，申校长推门走进来，紧紧拉住友新的手：“怎么，你在收拾东西，要走？”两位老同学的目光聚在一起。“胖子，你说说，咱们学校这不全完了吗？我只有回京了。”“友新，现在你不能走啊！别忘了咱校的学生啊！”此时，两人都落下眼泪，李友新用手翻着同学的作业本，“这些用功的孩子，我这一走，还真舍不得他们。”这真是发自内心的话语，他与学生的感情太深了。申校长与李友新坐下长谈，那夜谈到很晚。

第二天清晨，很多学生来到学校。在申校长的协调下，还是只留下两间教室，其余都被日本兵占据了。李友新已经连夜打好行李，准备回京，申校长也准备好了骡车就要出发。见此情景，学生们围住了校长和李老师。“李老师，您不能走

啊！”“李老师！我们要上学！”有几个同学竟跪在校长面前。李友新被学生的言行感动了，略一思考，他说：“校长，我还是留下吧，但就两个教室，这么多学生咱们怎么教法啊？”申校长挥着泪说道：“只要你愿意教下去，再难也能想出办法。”经过研究，决定每个教室留30个学生，分成初二初三各一个班。当日下午就又上起课来。

日本兵占据着学校，还抓民工为他们修炮楼，鬼子还到百姓家里欺侮妇女，抢猪杀鸡，害得周边的百姓民不聊生。牛栏山中学的师生奋力读书，他们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头脑，自立自强，宣传抗日，与日本鬼子做斗争。

初三有个高个子学生叫陈大旺，生长在贫苦农家，他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的成绩在班上是很优秀的。有时晚自习后，与几个同学到老师宿舍求教，提出青年学生要抗日救国。李友新与学生一聊就很晚，商量着如何把鬼子赶出学校。学生在陈大旺的带领下，深夜用搅和好的白灰水，用白布沾着在校外墙上画了不少大白圈，待第二天一早，鬼子兵发现后大惊，不知道白圈怎么画到墙上的，更不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把村里的保长叫来审问，鬼子小队长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在学校墙上画大圈？是什么意思，快快地说！”保长回答：“在我们农村，墙上画白圈是防狼的。”“什么狼？”鬼子问，保长答：“我们这的狼可凶了，样子很像狼狗，专叨老百姓家的鸡、鸭，可坏了。狼见了墙上画的白圈就害怕，自己会走开的。太君，我就知道这些。”鬼子队长转动着贼眼说道：“这么说此地狼不少，对我们的住处大大不利！”没过多久，这些日本兵将营房陆陆续续迁出了学校。

秋天，初三毕业班的学生忙着考试，李友新在课堂上认真地授课。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细心讲解，课后在宿舍里给同学补课，他教的代数、几何课，学生们考的分数都不错。期末考试后，学校举行毕业生欢送会，申校长在会上总结讲话，面对现实，鼓舞学生要自尊自爱，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学校培养出有文化的农民青年，也要为国报效，用学到的知识改善农村生活。师生们围坐在一起，都眼含着热泪，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毕业离开母校，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下午申校长又召集师生聚餐，厨子董庆炒了些拿手菜，大家边吃边聊，最后上的手抻面条，意味着大家长寿兴旺、事业发达。宴后，学生们打好包各自离校。这天晚上李友新在宿舍，心情很不平静，他想着自己教授的学生都离去了，熟悉的面孔何时还能再见啊，不觉得落下了眼泪，此时，窗前忽然出现学生陈大旺的身影。他有礼貌地叫门：“李老师您休息了吗？”“大旺啊，快进来！”李友新忙开门，让进了陈大旺。“快坐下吧，怎么对母校舍不得吧？”李老师问着，大旺眼含热泪拉着老师的手：“老师，我想您啊！”老师安慰地说：“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李老师，我是与您告别啊，您教给我们知识，我们长大成人了，正如校长所讲，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我让同村王成给家里捎话儿，毕业了我就要到外面闯荡。”“那你准备干什么去？”李老师关心问他。“老师，我早已做好准备，今晚连夜奔西山沿河城，那里抗日游击队营地，我此去投身革命事业，与日本鬼子斗争到底，报效祖国，不当亡国奴！”师生双手紧握在一起，

“大旺，你的行动我支持，但你只有16岁，年纪还小，遇事要多加小心，自己照顾自己，注意冷暖，保重身体。到了沿河城那边，千万要寄个信来，我们就放心了。”李友新边说着，眼泪大滴落了下来。转身从小皮箱取出5块银元，交给陈大旺。“大旺，老师的钱不多，你带着身上吧”，说着交到大旺手里。“老师，我不能要，您还得用哪！”大旺又推给老师，“大旺，你听老师的话，收下放好，我这里怎么都能过。到那捎个信我就放心了。”说着把银元放到大旺衣兜里。“老师，您放心吧。咱们会再见面的。”陈大旺提着包裹，推门而去，李友新眼望着他出了校门。

一天，李友新正在备课，邮差送来电报一封，打开一看内容：“妻子尤氏患重病，速归”。同事们见况都围过来，“你的课我来代，快回家看看吧”。大家你一言他一语，都来安慰着他。申校长跑过来，拉着李友新的手：“快快，我帮你收拾东西，叫个驴车去，嫂子得的什么病，快回去看看。”边叨唠着边向校门跑去。李友新在宿舍忙打点东西，带上几个月的薪金，将房门锁好了。这里，申校长跑进来，一边叫着：“友新，快上车！”同事们帮着提包裹，李友新便与大家匆匆告别。

待驴车行至北平东直门时，已是傍晚时分。李友新又等电车，带着行李坐到交道口站，下车忙往家赶。走进后圆恩寺胡同，一路小跑来到自家门前，拍着门环高喊：“快开门，我回来了！快……”，长女玉秀跑来开门。“爸！您回来了……”，玉秀说着哭了。父女快步进了西屋，来到尤氏床前，此时长子永元、二子永和，都站立在

母亲床边，叫着“妈！妈！我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此时，尤氏双眼紧闭，嘴在蠕动，好像是要什么。“玉秀！大夫看了说什么病？”李友新一个劲问女儿。“爸，上周妈发高烧，找了鼓楼后湾药店的王大夫来家看的，开了汤药，服药后烧退了些，后来妈什么东西都不吃，又接大夫过来，开了药。”玉秀述说着，李友新拉着尤氏的手，叫着“孩子他妈，我赶回来了，你睁开眼呀！”用手轻摇着她的头，“啊！还这么烫呀！请过西医吗？永元。”“爸，没有，只给妈喝中药。”永元答着，李友新忙站起来，急得手忙脚乱，说：“快，得请西医，西医的效果快。”李友新说着向屋外走去。

“爸，您找大夫吗？”玉秀追出来，“你们看着病人，我去找西医来”边说着大步开了街门。此时夜空中一片星斗，街上很寂静，不少店铺已关门打烊。李友新寻思到哪儿去找西医大夫呢？他从南锣鼓巷走至地安门大街，又往北跑到鼓楼前的宏仁堂，叫开了夜间售药的大门。经值班人指路，说东边方砖厂胡同里有位西医左大夫。经过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西医。但左大夫已经睡了，有些不想出诊。李友新此时心急如焚，再也克制不住自己，跪在大夫的床前，“我求您了，我这个苦教书的人求您了！”此时，左大夫的妻子已穿好衣服，准备好出诊的皮包，左大夫忙扶起李友新，“兄弟，别这样，我去就得了。”左大夫穿好风衣与李友新一起狂奔后圆恩寺胡同，进了胡同就见到友新的两个男孩已站在街上。“爸，西医大夫来了吧？”“来了，这是左大夫”，李友新边说着随大夫进了院门。此时，西屋里传来“妈呀，妈……”玉秀的呼喊声，大家跑进屋，左大夫拿出听诊器，此时尤氏

脸色发青，呼吸微弱，双眼紧闭。大夫忙翻开尤氏眼皮，心中已然看出了大概。接着为病人打了一针，说道：“现在这一针打过，如果救不过来，也就没办法了。”屋里静极了，大家的心紧到了一块。过了半个小时，大夫又翻看病人的眼皮，说道：“瞳孔已散了，人不行了。”“孩子他妈，我来晚了，啊……”“妈呀！妈……”李友新一家顿时哭喊一片，左大夫忙劝慰着：“先生，别难过了，孩子们别哭了……”。医生忙看手表：“你们要记下了，病人过逝晚十点整。”屋门开了，李友新的父亲李实臣过来了。老人手握拐棍，来到医生面前，“大夫病人还有救吗？”左大夫摇着头。

正当李友新为其妻尤氏办理丧事，全家人忙后之际，顺义牛栏山中学来了两位教师，转达了校长的关照，送上三个月的薪金，他们代表学校协助李老师料理事务。尤氏的病故，确实使李友新一家振动极大，好端端的一个家散了半边天，李实臣夫妇已年尽六旬，友新的三个子女即将长大成人，尤氏的突然离去，全家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均受到打击和影响。友新定下心来，料理家务，每天给三个孩子辅导功课，尤其对正在读高中的老大永元的学习上给予重点帮助，父子俩对高中毕业后选择哪个大学有所考虑。他对女儿讲：“我不在家，照顾爷爷奶奶的生活，做家务全靠你了。”并决定带着老二永和去牛栏山读书。（未完待续）

## 文化名流与来熏阁的书缘

□ 赵淑珍

位于北京西琉璃厂的来熏阁，是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老店。老板姓陈，原以收售古琴为主，店名为“来熏阁琴室”。清朝光绪年间，店铺租与他人经营。后陈家侄子陈连彬收回店铺，改为经营古籍版本，店名仍用原名。但因经营一般，故而业务平平。之后为店铺的经营，陈连彬找来他侄子陈航（字济川）帮他经营。由于陈济川精明能干，经验丰富，而且熟悉古旧书业务，故而生意兴隆，店面扩大，店员增加，发展快速，多时店员达20多人，铺面由一间增加至三间，年营业额高时达10万元，为琉璃厂有名的店铺。1940年，来熏阁在上海增开分店，生意依然兴隆，直至公私合营。

来熏阁的迅速发展与陈济川的努力分不开。雷蒙水《琉璃厂书肆四记》中写道，陈济川对“版本甚精，业务经营亦广，虽年过花甲，记忆犹强，凡罕见之书，某年售价若干元，归何处，随口说出，无稍差。”有这样的人经营，店铺岂能不兴旺。公私合营后，陈济川在中国书店任副经理，1968年去世，终年68岁。

因近几年买书大多从网上购买，所以来琉璃厂不太多了。近日，因访书我又来到琉璃厂，走到西琉璃厂旧址，见原店面已不是来熏阁，一位女士告知，来熏阁已于两年前搬走。顺着她的指路，我向西前行几十米，来到古籍书店，见二楼挂着来熏阁匾额。走进店里古朴典雅，书香满溢，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这座百年老店历经沧桑，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多少年来，文人墨客为研究学问，与来熏阁结

下了缘分，也与来熏阁老板陈济川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到来熏阁寻书、访书、买书、编写与出版书，为此留下了多少佳话。

### 郑振铎与来熏阁

著名作家郑振铎先生，是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仅对古旧籍中的戏曲、小说、弹词兴趣浓厚，对有插图的书籍也情有独钟。由于他爱书如命，寻书成癖，便常去逛琉璃厂寻书找书。在这些店铺中，来熏阁常见其身影。在他的藏书中，不少好书是在来熏阁买到的。在他的研究中，这些书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来熏阁上海分店收进了一部《太古音大全集》，这部书是琴论专著，属于稀世珍物。原刊于明朝永乐十一年，原名《太古遗音》，后于嘉靖年间杨祖云更名为《琴苑须知》，明初时袁均哲为此书作注释。全书共六卷，包括制琴、琴式、手势、杂论、指法、调意等内容，为现存最早的琴论专著。书中保持有唐、宋时期的有关文献。来熏阁收入的这本书属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原装两册，半页11行，每行26字，并附有百余幅图。书中除有“乌程周庆云”和“别号梦坡”的印外，卷末还有丁巳二月袁寒云题跋。得知这一消息，郑振铎喜出望外，立即赶往来熏阁，希望买到此书。此书极为罕见，书价也高，尽管郑振铎生活拮据，但他还是买下此书。这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郑振铎与来熏阁交往甚密，所以后来他所

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诗余画谱》《顾氏画谱》《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等书，均得力于来熏阁所购书的帮助。

由于书缘，郑振铎不仅常到来熏阁买书，而且还与老板陈济川结下深厚的友谊。日伪时期，郑振铎曾担任《文学月刊》主编，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在刊物上多次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的行动不但引起敌人的注意，且受到日伪当局的通缉和搜捕。为躲避敌人的搜捕，郑振铎在危难之际找到来熏阁的老板陈济川先生。陈济川将郑振铎安排在上海来熏阁分店的二楼上，由上海分店老板张世尧照顾其饮食起居。为了郑振铎的安全，张世尧每天去饭馆叫菜，并亲自送上楼。在郑振铎隐蔽的十多天里，有不少同志以买书的名义前去看望，并商讨问题。当时在敌占区的上海藏身很困难，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只有不怕株连的人才会掩护他人，而陈济川如此这样，可见他与郑振铎的交情何等密切。

### 魏建功与来熏阁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语言教育家、古文献学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魏建功，与来熏阁更是交往颇深。

魏建功先生是研究语言文字学的专家，由于他经常到来熏阁访书、买书，于是与书店的老板陈济川私交甚密，他对陈济川也极为信任。上世纪20年代魏先生在汉城帝大（今汉城大学）任汉语教师时，他写给未婚妻王碧书的私人信件很多都是由来

熏阁代转。1937年11月，魏先生随北大南迁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他的家属暂留北平，当时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1938年春节前夕，为了让魏夫人和孩子们过一个宽裕的年，老板陈济川派人给魏夫人送去面粉和钱。为此他们非常感动，直到许多年后，魏先生仍念念不忘，常向别人提及此事。

抗战胜利后，魏先生只身一人由四川重庆到台湾赴任，随后家属也随之赴台，当行至上海时，正值中秋佳节，魏夫人及子女因经济拮据被困，不知如何是好，知此情况，来熏阁立即派人送去白面、猪肉和钱，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为此他们全家深受感动。

感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多少年来，魏建功与来熏阁的莫逆之交胜于言表。每当有困难的时候，来熏阁总是鼎力相助。来熏阁对魏先生就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彼此非常默契。魏先生也是如此，每次遇到有朋友到北京来，他都介绍他们到来熏阁买书。他编辑的《钱玄同遗墨》和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的《中华新韵》，都是由来熏阁上海分店出版发行。

“文革”期间，来熏阁被查抄，陈济川也于1968年含冤离世。当时妻子卧病在床，子女上山下乡远离京城，真是门庭冷落，寒室凄凉。在这危难之际，1969年春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先生悄悄来到陈济川的家。他身着深色大衣，头戴蓝色帽子，并将帽檐压得很低，轻轻推门进来，进门后小声说道：“我是魏建功！”说完之后，他不再说话，也没坐下，神色黯然地走到床边来，向陈济川妻子俯

身安慰，并将陈子女的去向一一记在本上。试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被查抄的家谁敢去冒着危险去探望，人们躲还来不及呢。而魏先生却不然，是什么让魏先生如此仗义，是由书而结下的友情使然，这就是危难之际见真情。1980年春，魏先生逝世了，临终前魏先生把子女叫到床前，嘱咐子女们说：“你们以后不能忘记来熏阁书店的同事们和陈济川一家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 名流书缘传佳话

来熏阁做买卖诚信第一，陈济川更是为人热情正直，因此许多文人不仅到来熏阁买书，而且还把来熏阁当作“家”。他们或来此吟诗作画，或叙叙友情，或需要帮助，或躲避灾难。著名甲骨文学家胡厚宜与来熏阁就有着一段特殊的交往。日伪时期，在重庆工作的胡厚宜研究考古学，需要于省吾编著的《双剑谿殷与骈枝》和《双剑谿古器物图录》等重要书刊。胡先生联系到来熏阁时，陈老板千方百计找到此书。当时形势非常严峻，要从沦陷区往重庆寄书非常困难。加之邮递条件很差，丢书现象经常发生。来熏阁老板陈济川为了不影响胡先生的研究，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书拆开，分别装在若干个信封内，然后又分别从几个邮递所邮寄，最后几经周折才把书寄到胡先生的手中。抗战胜利后，胡先生回到北平见到陈济川时，几次要把手款付给陈济川以示感谢，但都被陈济川谢绝了。不仅如此，来熏阁还为胡先生出版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多种书。对陈济川的无私帮助，胡先生非常感动，他说：“来熏阁

书店陈先生的这种深厚友谊，我非常感谢，终身难忘。”

著名学者胡适也曾是来熏阁的老朋友，他与陈济川也有着很深的交往。在胡适先生研究中所需的书，只要来熏阁有，陈济川都是亲自送去。平时胡适先生怕别人打搅，在书房挂上一条福：“整理旧作，请勿多谈”，意在谢绝别人的打扰，但只要是陈济川来，他无论多忙都热情接待，办完事后，都与夫人亲自送出门外，再送上洋车。解放前夕，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终日生活奔波，哪还有人读书，所以书价直降，看着许多有价值的古旧书因货币贬值而随意处置，许多文人只能望书叹息，无可奈何。对此，陈济川找到胡适苦陈此状，求胡适向政府反映。胡适对陈济川的意见不但认真听取，并且郑重向南京政府反映。经过努力，南京政府终于拨款10亿用于抢救古旧书。此事虽为杯水车薪，但对古旧书的保护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胡适与陈济川的交情非同一般。

书店是文人之家，来熏阁正是这样。许多文人都与来熏阁有着深厚的友谊。据来熏阁老板陈济川后人介绍，除上述文人外，像齐白石、王雪涛、吴晓铃、侯宝林等都与来熏阁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是纽带，书是桥梁，书是朋友。一方是买书，一方是卖书，然而除了买卖这种关系之外，却有着比买卖更重要、更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友情，这就是书缘。

## 褚连祥与“西来顺”

□ 满恒先

褚连祥是老北京清真菜系领军人物、著名厨师。“西来顺”开业不到20年，却是北平颇具盛名的清真馆之一。“西来顺”号称西菜大本营（老北京清真菜系分为东、西两派，东派以“白魁老号”为主），其名气与地位离不开掌灶褚连祥。

君三祝褚理經順來西



1937年褚连祥

### 学艺御膳房

褚连祥（1889—1947），亦名褚祥，字祝三，北京牛街人。据说，他的父亲曾在“元兴堂”做过跑堂，也有人说褚姓四代厨艺传家。但是，笔者以为，褚祥所以成为一代名厨，除了家庭熏陶，主要还在于他有见识，眼界宽，爱钻研，始终不离开灶台与食客。他的成功，就在于早年厨艺生涯的三段经历。

因为家贫，褚祥自幼失学，很小就投在牛街“厨子杨”杨华亭门下学徒。“厨子杨”属“跑大棚”的，专应回民红白事招待宾朋的宴席。“跑大棚”几乎是厨艺的全武行，特别是流水席，搭灶、备料、加工、摆桌、翻台，还要红白两案兼顾。席面依本家要求，既要排场、体面又须实惠，丰简适宜。所以，这一行人必须厨技全面，尤以选材、刀工与用火最见功底。就以用火为例，他们的行灶很有讲究。行灶大小要依用餐人数，多少席面而定，是“陀螺”（单眼儿），还是“三眼儿”，煎炒烹炸乃至烧开水全靠它，没有点真功夫，搭的灶不好使，就容易耽误大事。老北京人礼数儿多，回民更得加个“更”字。所以，“跑大棚”的还须深谙教门规矩，了解本家的辈分关系，尤其新亲席、教

席之间须格外用心。另外，“跑大棚”的重信誉、讲外面。无论亲友举荐，还是应约承领，处处得主家着想，拿人家的事当自己家事办。褚祥“跑大棚”，不光学了手艺，还懂得了回民的人情世故与待客之道。这为他日后掌灶清真馆，领东“西来顺”奠定了基础。

到20岁时，经人引荐，褚祥来到清宫御膳房，虽只是打下手（帮案），却是他一生的难得经历。御膳房是最高档次的厨房，无论食材食具，还是选料、烹饪技法，都是民间“跑大棚”无法比拟的。褚祥在御膳房干了几年，悟出了高等宴席的丰富内涵，见识了食材的罕见极品，领略了餐饮文化的博大精深。以食材和烹制为例，清真菜系传承百年，燕窝鱼翅从来不用，西餐技法更是不碰。褚祥在御膳房的经历，为他日后对清真菜系的改良、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4年，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正式当了大总统，又任命一批政府和各省官员。一时间，北京城里冠盖云集，觥筹交错，庆典活动纷纷举办。为了照顾西北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上层人士和内地回族官员的饮食习惯，北洋政府大总统府特意开设清真餐厅。褚祥应聘担任清真餐厅的掌灶。此时的褚祥厨艺已至纯熟，一般的席面均不在话下。这些穆斯林官员、王公很欣赏褚祥的手艺，就是一些非穆斯林官员、名人也都对他推崇备至。后来，许多名人追着他，品尝他的名菜、创新菜。这一时期，褚祥在北京上层人士中积攒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 领东西来顺

以后，褚祥辞了大总统府的差，在前门外的清真餐馆大显身手，那已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褚祥掌灶“又一村”时，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京城的

事，即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的小舅子与人争执，进而发生火并，这件事就发生在“又一村”。事后，是马连良从中斡旋，这才保住了“又一村”。此事应发生在1920—1926年间，即王怀庆在任上时。后来，褚祥做了一道拿手菜——香酥鸭，用以款待马连良先生。这就是后人演绎的“马连良鸭子”的典故。

关于褚祥掌灶“又一村”，《震宗报月刊》这样报道：“因为他做菜特别有讲究，所以有很多顾客约他开饭馆。因此，石头胡同中间，就在花村柳巷当中，平添了一座‘又一村’大饭馆。一时真是：山阴道上，大有迎（应）接不暇之势。”（《震宗报月刊》第三卷第9号）

“又一村”约在1929年歇业，此后褚祥在“西域楼”掌灶。（“西域楼”开业于清末光绪年间，店址在大栅栏东口）但可惜好景不长，“西域楼”不久也关张了。

褚祥的事业辉煌，是在来到“西来顺”，直至倒在灶台旁的16年间。

“西来顺”开业于1931年，其原址是“南园澡堂”，位于西长安街路南，老门牌82号，紧挨着清真“一亩园”，房东是武克绳。“西来顺”虽然临街，但店面后收一段，食客须穿过一条窄道儿，才得进入。“西来顺”的发起人是北平总商会会长冷家骥。他看中的是褚祥的手艺与西长安街这块地势。“西来顺”参股者共58人，褚祥为入力股，因是名厨，被委以“领东”，兼了事掌柜，即今之职业经理人。

“西来顺”新张即来了个“开门红”，大批追随者、慕名的食客蜂拥而入。老主顾中不乏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据说，马福祥、马鸿逵父子，溥侗、雪艳琴夫妇以及伶界马连良、尚小云、荀慧生等都是“西来顺”的常客。尤其马连良与褚祥有着异乎寻常的交情，他不仅是“西来顺”的客人，还是菜品的鉴定专家。有文章说“西来顺”在1937年倒闭，褚祥流落到“三元店”“两益轩”，这不是事实。笔者看到，《震宗报月刊》自“西来顺”开业就屡有报道，广告连篇，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

夕。1947年7月29日，正在炒菜的褚祥猝然倒地，死在灶旁。应该说，是褚祥掌灶“西来顺”，带来“西来顺”的红火。

“西来顺”的红火，离不开褚祥这块金字招牌。透过诸多描写褚祥做菜的文章与史料，笔者在思索褚祥的做人，并试着用“诚心正意、敢为人先、文化自觉”总结他的厨艺人生。

褚祥一生做出了无数美味佳肴，每道菜他都一丝不苟，认真操作。褚祥掌灶，无论多忙，也要按程序来，一勺只炒一卖，“萝卜快了也洗泥”。他做的菜都要接受食客的检验和品评，他常徘徊于客座与厨房间，眼观耳听，发现并纠正服务与菜品的质量问题，甚至亲自尝一尝客人吃剩的菜，从中发现味道好坏和食客的喜好。有时他还亲自跑堂，把菜端到桌上，悉心听取意见。褚祥的成功，有赖于他的好钻研、脑子活、想象力丰富，但根本的一条是他为顾客服务的诚心正意。

刊月宗震
24

**館飯化濟經**

周餅飽

本館精做京師各樣菜點四季點心  
口味地道口容裝項煨燉鴨蟹類  
插翅羊肉水燻羊肚肉餅等類  
法與眾不同定價尤為克己取稱最  
經濟的飯館每人用極少的錢就可達  
到滿意招待格外週到營業時間自  
午八時起至夜間二點半止開設北京  
前外後市街中間路東便是電話三五  
一一一此致  
諸位先生台鑒

**時代化的清真廣興園浴池**

本堂開幕二十餘年，為北京久負盛名之浴池，樓上客  
盆、樓下雅座款式衛生、溫熱三池、新式暖氣、高聲  
理髮、樓上池堂、對於回教沐浴，另有潔淨浴室、自  
來水管、溫暖自便，故親衛生，兩有裨益，誠京市回  
教唯一之浴池，賜顧請公  
光臨極極歡迎

交通路南  
電話二二九五 本園經理趙錫璋啟

南路口西街安長西

要需會社合迎

**莊飯肉羊園畝一真清**

開頭諸君	屋宇寬暢	經濟小吃	喜慶外會	遠客小酌	炒涮羊肉	所做菜蔬	本園揭幕
盍興乎來	願合衛生	特別價廉	定期不假	無不適宜	獨具特色	法却新穎	多蒙讚許

◁五六五二局南話電▷

南路口西街安長西

**順來西**

本號為中國回教飯館中之翹楚，我國南  
北聞名，北開入教者，如欲嘗試回教菜蔬特味者  
，無不先臨敝號，蓋因本號有  
中西合做的大餐小吃  
有

衛生適口，用料絕取純潔，不傷教規，  
不圖厚利，諸公賜顧，無任歡迎。

南北菜蔬珍饈海味 製作  
電話南局一九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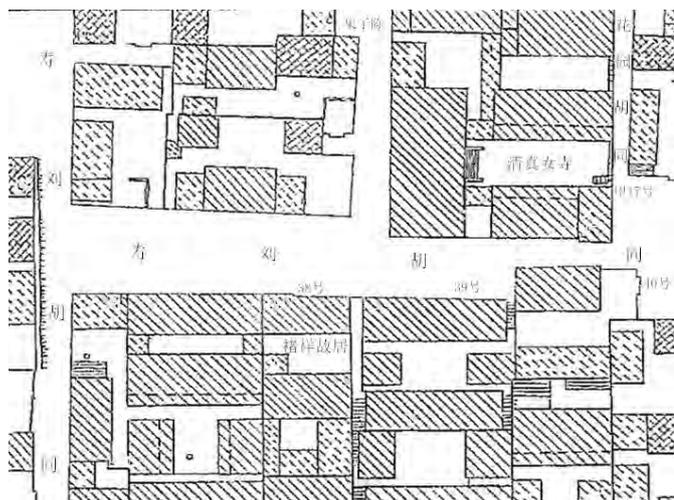
当时清真饭馆广告

“西来顺”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褚祥的菜品继承传统又不断推陈出新。老话儿说“一招鲜，吃遍天”，褚祥岂只一招鲜！清真馆常见的牛羊菜品自不必说，就是高档的“全羊席”，褚祥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60多道菜。《北平旅行指南》列出“西来顺”的拿手菜有“扒三白”“沙锅鱼翅”。其实褚祥的创新菜达到70多种，诸如芙蓉燕菜、红烧鱼翅、扒海羊鱼翅，还有借鉴西餐技法的西法大虾、罐焖羊肉、鸭泥面包等。褚祥的创新，打破了清真菜肴在食材、技法等方面的固步自封。褚祥的菜品既遵从伊斯兰教法，又新颖别致、好吃好看，从而提高了清真餐馆的社会知名度。褚祥于清真餐饮业的贡献，源自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人们常津津乐道名人与餐饮的故事，其实它是一种文化现象。以褚祥与马连良为例，前者是勤行名厨，后者是伶界名角，他们其实是惺惺相惜的关系。褚祥识字不多，但他身上有一股“匠气”，所以他做出的菜匠心独运。由此我想到一个成语：“匠遇作家”，其意为：“有专长的技工与能手、行家，双方本领不相上下。”（《中国成语大辞典》60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褚祥一生追求烹饪的最高意境，他将清真菜系升华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坐在“西来顺”品尝褚祥的“一品芙蓉虾”，犹如在“长安大戏院”欣赏马连良的“借东风”，二者都是“带响儿”（喝彩）的艺术享受。也许不是刻意为之，但褚祥的厨艺实践，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 厨艺后来人

褚祥生前“西来顺”红火一时，身后却一落千丈，以致在1948年底倒闭。褚祥以后，“西来顺”原股东潘某接任掌柜。潘年岁较大，又是西单“恒丽丝绸店”的老板，无法全力经营“西来顺”，遂有其弟潘某兼理“西来顺”。店内4位“司账”（会计），其中两位是汉民。褚祥6位徒弟，只剩宋恩志一人，梁德山等业务骨干也另谋他就。此时的“西来顺”虽仍打着“清真”旗号，但已属“顶帽”（铺东、铺掌为汉民，少数回民支应门面）。1948



寿刘胡同褚祥故居

年7月，“西来顺”重张开业，但红火、热烈的场面早已不再。

褚祥的6位得意门生是高义、马德鸿、马德起、卢殿元、金世光、宋恩志。其中大多早在“又一村”时就追随他的左右。金世光后来到了“南来顺”，是最早荣获“全国清真菜特级大师”称号的名厨，他的徒弟周志来等后来也都是大师级的名厨。马德鸿、马德起后来到了“东来顺”。1960年，马德鸿在总结恩师褚祥烹饪实践及自己掌灶“东来顺”的经验，撰写出《清真名菜谱》，为褚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高义后来去了“同益轩”，1956年以后掌灶“鸿宾楼”。宋恩志年岁最小，他后来在朝内“东德顺”掌灶。卢殿元后续消息不详。

应该说，褚祥还有一位弟子，那就是他的儿子褚慈良。褚祥夫人郑氏，育有一子五女，褚慈良为长。早在“又一村”时，褚慈良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上灶操作。他炒出的菜，褚祥亲自端盘上桌。顾客一边品尝着，褚祥边听意见。21岁时“西来顺”开业，他已经能站灶，应付席面了。父亲故去后，他投奔安国栋领东的“同益轩”。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转行零售业，褚祥的真传亲授就此搁置。褚祥故居在牛街寿刘胡同38号，其位置就在清真女寺南邻，临街小院北房三间，南房三间，还有一座小后院，总计十余间房。这大概是褚祥奋斗一生为妻儿挣下的唯一产业。

## 什刹海的水域文化

□ 于永昌

一条大河波浪宽。历史上，浩浩荡荡的永定河流经北京地区，奔突，扭摆，历经千万年，冲刷着大地，逐渐形成了什刹海等一系列水域。有了这“一湾绿水”，此地成了元代“帝王之都”的潜质，顺理成章成就了元大都，形成了大都城和什刹海的诸文化。

金末元初时的白莲潭其湖面东西横宽，西南岸线远至明清北京内城西北角的后桃园一带。在气候干燥缺水的北方，有如此充沛的一片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有五德，因它长流不息，能普及一切生物。水最被人看好的是，它是一种廉价的自然资源，在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水与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事物组合，产生紧密联系，并由水衍生出水文化。

喜水、近水、伴水、趋水、赏水、嬉水，是不同人群、居民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依托积水潭的开阔水域建造而成的元大都，成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中最辉煌的经典之作。位于大都城中心位置的积水潭，水面广阔达600多亩。元代诗人杨载有诗云：“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描述了积水潭连接运河，水势的浩淼。周围水景风光最是让人赏心悦目。元代《都水监事记》载：“监者，潭侧北西皆水……堂后为大沼，渐潭水以入，植夫渠荷芰。夏春之际，天日融朗，无文书可治，罢食启窗牖，委蛇骋望，则水光千顷，西山如空青。”如实记述了积水潭东岸风景之美。

这时的积水潭岸畔，泊满了漕运的船只。《大

都赋》对此描述道：“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檣，繁于南山之笋。”沿湖岸建有寺庙、楼阁、衙署和紧临湖区引水修造的园林。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以“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之句，赞美了积水潭的如画景致。《析津志》也有载：“若海子上，车马杂踏，绣毂金鞍，珠玉璀璨，人乐升平之治。”道出了积水潭岸畔极尽热闹繁华。

元代对积水潭水域的开发，带来的城市环境效应就是：积水潭沿岸成为了大都著名的商业区、风景区和文化区。万千漕船乘风破浪，将南方货品粮米、丝绸、茶叶、家具、文具等源源运到大都城，易物装运上北方牲畜、煤炭等满载而返。千帆万橹竞驰，成了积水潭浩瀚水面上的壮观景象。一年到头没有休止的漕船运输繁忙，给积水潭沿岸带来了兴盛繁荣，使这一地区的商业、仓储、旅游业、文化娱乐业等都兴旺一时。随着周围景色风光受人喜爱，沿湖寺庙增多，官员府邸、私人园林、民居更是鳞次栉比，搭建填满了一处处空地。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一条运河。明代漕船不再进入北京城，什刹海失去漕运码头的功能，但这里水域宽阔，有着水库的效应，对调节下游运河和都城供水作用极大。明代的京杭大运河北端变为东便门外大通桥，运河河道长度仍有3000余里。明清时期北京的宫殿、城池建设所需的木材、石材、砖瓦等用料，大都是通过大运河运抵北京的。明永乐、嘉靖年间修建的北京城宫殿、城垣及皇陵等，所用的大批楠木、杉木多是从

南方几省砍伐，由长江漂运到扬州，然后转入大运河，再运至北京。经漕运运往北京的，还有城建所用的成千上万块苏州大金砖、临清大城砖等。

漕运是一个物质体系，也是一个文化体系，是农耕时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集中体现。什刹海在元代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终点码头和漕运的目的地，大批漕船日夜往返，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创造了这一地区的鼎盛辉煌，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漕运兴发的商业文化、旅游文化、住宅文化、戏曲文化等，自此经久不衰；宗教文化、园林文化、生态文化、休闲娱乐文化等也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传承。从众多史料中，人们能够领略当时浩瀚水面千帆竞发、万船往返，岸畔桥头游人如织，观光赏景，街市间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盛况。漕运和漕运文化对什刹海的演变发展是有着极其深远影响的。

明初时积水潭上游的白浮泉水源断流，积水潭不再是大运河漕运的北终点码头。湖泊面积缩小，但这里仍然是京城最大的开放水域。湖面岸畔由热闹转向了宁静，渐现江南风光，形成了众多旅游景点，吸引文人墨客联袂而来，游湖吟诗。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在《西涯杂咏》一组诗中吟道：“高楼沙口望，正见打鱼船。”“秋风吹芰荷，西塘凉意早。”“水田杂花晚，畦雨过溪足。”从句中可知，这时的什刹海水面有了打渔船、水稻田，秋风中摇曳着莲藕、芰荷，一派江南风光。

明代德胜桥西边仍称积水潭，也称西海；德胜桥以东称什刹后海、前海；后来统称这三片水域为什刹三海。明中期为了保证皇城内太液池的供水，将积水潭与后海隔开，单独修了一条转河直达前海南侧，保证优先将清洁的河水输送到太液池。有了富裕的水再从前海通过银锭桥流入后海，这样就形

成了“银锭观山水倒流”的场景。清代为保障皇城用水和皇家园林管理，朝廷专门成立奉宸苑。明文规定，非皇帝之令，任何人不准引用什刹海之水。此时期的什刹海湖光水色尤为幽雅秀丽。皇亲国戚沿湖大建王府花园，一些朝廷重臣也将宅邸建在湖岸。沿湖柳荫夹峙，府邸相望。后湖畔明珠府纳兰性德有诗云：“野色湖光两不分，碧云万顷变黄云。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亭挂夕曛。”诗中赞叹了什刹海水域景色浩淼、朦胧、雅致，有着江南风光之美。

民国到来，环什刹海水域平民色彩变得浓重。每逢农历三月，都会有众多游人至水滨游览，行古人“春禊”（在水边举行袪除不祥的祭祀并嬉游、采兰、沐浴的习俗）之乐。有一年，居住宣南的汤涤、孟森、陈衡恪等一行人在什刹海修禊，孟森作小记云：“席而饮，酒酣，或弈或歌，或弹琵琶，或玩。谈震屋瓦，水禽拍翅惊起。淑风疏襟，凭栏望西山，岚光浮动，欲袭衣袖，几不知身在长安也。”位于城内各处的游人，夏日还喜欢到什刹海观莲，观赏后海广化寺举办的盂兰盆会、放河灯、放生等活动。游人也可泛舟、钓鱼，在荷花市场游览。冬季则可在前、后湖畔观赏雪景，走到湖面冰上嬉戏滑冰，坐冰车赏玩一番。位于京城深处，却有着水天风光“野趣”的什刹海，一年到头游人络绎不绝。

什刹海自元代形成了动静结合的水域环境，几百年来一直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这片水域滋生、培植了什刹海的水域文化，并成为什刹海各类别文化的总载体。而随着这里各项文化的发展繁荣，内涵外延，什刹海这片水域也为更多的人所知，以至名扬中外。

## 槐宝庵今昔谈

□ 董宝光

什刹海前海北岸迤北，什刹海后海南岸迤南，形成一半岛地带，岸边高柳古槐，面水临风，景色秀美。夏秋时节，瑰丽的荷花和苍翠的莲叶，更使得这里的景色有如仙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完全是对这里环境的真实写照。这里称为金丝套地区，明清两代建了一些庙宇，有的庙宇颇具传奇色彩。

### 隐匿深巷中的古刹

在大金丝套胡同西段路北，有一条南口通大金丝套，北口不通行的死胡同，长约50米，宽约2米，大致呈南北走向。北巷路西有座古刹，名槐宝庵，巷以庙名，亦名槐宝庵，此庙1965年以前的旧地址系槐宝庵胡同5号。

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介绍，据传，此庙建于明朝天启年间，原名净海寺，清代名槐宝庵。《什刹海志》载，此寺名曰探海寺。《燕都丛考》引《燕京访古录》谓：“古槐在什刹海西北隅，有寺曰净海寺，俗曰槐宝庵，为前明天启时建，后为清初达天和尚挂锡之区。内有古槐一株，其干南倾而枝北向，树心已空，叶犹茂盛，其势蜿蜒，宛若龙蟠。上系铁链如纆，询诸土人云，因达天参修时，此树尝为人祟，故制巨链以制之。今仍存。”

据此可知，净海寺内有古槐一株，不仅“树心已空”，躯干奇古，且“其势蜿蜒，宛若龙蟠”，形态殊异。可见其年代之久远，很可能是先有古槐后建此寺。更有甚者，在达天和尚参禅时，它“尝

为人祟”。表明此古槐已成“精灵妖魅”。为此，高僧达天系铁链以镇之，使其皈依佛门。今日观之，此传说之辞不足信也。

### 庙不在大，有异则名

笔者认为，佛门中的佛、法、僧谓之“三宝”，亦即使此具有“灵性”之古槐服从佛门三宝，高僧达天诚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也。《西游记》中，唐僧的三位弟子，原为山林湖海中的精灵妖魅，然皈依佛门之后，即成金刚罗汉，弘扬佛法济困扶危，终成正果。此古槐与之同理也。庙中有此皈依三宝的古槐，世人即据此而称之为槐宝庵矣。或谓，世人尊仰寺院，辄以“宝刹”或“宝庵”称之，今此庙有此殊异之古槐，世人遂以“槐宝庵”敬称之，以示尊崇景仰之意也。

《什刹海志》谓，此寺名曰探海寺，盖因这株皈依三宝之古槐，其干南倾系探向什刹前海，而枝北向则系探向什刹后海也。此古槐之枝干如此，此古刹遂又以探海寺名之也。

概言之，因此具有灵异之古槐，而使此寺之名彰显于世。无论槐宝庵或探海寺，在庙名中均隐含此古槐之特性也。

《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一书中，载有此庙1928年和1947年之史料，此庙名为槐宝探海寺。现将此书所载1928年的情况转录如下：

槐宝探海寺 坐落内五区槐宝庵5号，本庙面积北面五丈六尺，南面三丈七尺，西面十三丈，东面

一丈三尺，瓦房十七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私有家庙。庙内法物有泥像十一尊，铁香炉烛扦，花筒共三堂，木花筒一对，锡五供一堂，鼓一个，锡烛扦一对，锡香筒一斤，铁钟一个，铁磬一个，木鱼一个，木烛扦一对，铜磬一个，供桌五张，铁鼎一个，另有大念珠一挂，木匾两块，一无尽灯，一三观清楚，槐树一棵，上有铁锁一根。

从所列庙内情况来看，此庙虽有一定规模，然规模不大。至于十一尊泥像系何神佛？两块木匾所书何字？就不得而知了。《辞源》释“庵”曰：“小庙”。槐宝庵庙虽不大，然因这株殊异之古槐而名闻京师，系一座颇具特色的庙宇。称此古槐为本庵之宝，当不为过也。

此寺虽建于明代天启年间，然绘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乾隆京城全图》和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详细帝洋舆图》，均不载此寺。笔者查阅了《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天咫偶闻》《京师坊巷志稿》《光绪顺天府志》等清代典籍，均未见有关此寺之记载。

综合所见资料可知，此庙有三进院落，山门辟于一进院之东墙，坐西朝东。一进院内有前殿三间，坐北朝南，硬山合瓦顶，通面阔9.4米，进深5.9米。二进院有正殿三间，前出廊，硬山筒瓦卷棚顶，通面阔11米，进深9.4米，两侧有耳房各一间。东西配殿各三间，硬山合瓦顶，元宝脊，面阔9.4米，进深4.4米。二进院东北角辟旁门。正殿后为三进院，面积不大。

《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载，此庙正殿前檐的瓦当和滴水均系绿琉璃瓦。然按明清两朝制度，只有敕建的庙宇才能使用琉璃瓦顶，否则即属逾制。笔

者目前尚未见到此系敕建庙宇的资料，至于此庙使用琉璃瓦顶的凭证，尚待进一步考证。

《北京寺庙历史资料》明确记载，1928年此庙为“私有家庙”。同书700页载，1947年槐宝探海寺的管理人名杨玉棠。称管理人而非住持僧，亦属家庙情形。清初，达天僧在此庙挂锡参禅，表明当时此系正规僧寺。何时由正规僧寺转而沦为私有家庙？目前缺乏史料，无由考证。

### 解放后之槐宝庵

1965年，大金丝套胡同易名大金丝胡同，槐宝庵胡同并入大金丝胡同。原槐宝庵庙址——槐宝庵胡同5号院，又分成两个院，原一进院（包括原山门和前殿，旧门牌槐宝庵5号）新址为大金丝胡同35号，和原二进院（主体院落，旧门牌槐宝庵5号旁门）新址为大金丝胡同甲33号。

笔者近日至北京市档案馆，拟查询槐宝庵5号解放前的房档，但该馆未收藏这份史料，故这部分内容现无从知晓。

笔者又走访了西城区测绘所档案室，查阅了槐宝庵5号解放后的房档。并至大金丝胡同甲33号（槐宝庵原二进院旧址），拜访了此宅院之主人张靖先生。张先生生于1955年，50多年来一直生活于此院，向笔者介绍了此院的有关情况。

张靖先生之父名张恺骥，字万里，生于1912年2月7日，祖籍江苏无锡。早年就读于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专攻花卉。其画作落款多为张万里。毕业后即随侍白石老人，负责白石老人的对外事务工作。解放前曾创办艺光国画学校。1951年5月参加工作，任西城区干部业余学

校语文教员，兼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员，专长花卉。1956年患脑血管病，半身瘫痪。病休8年不能工作，遂于1964年7月办理退职手续。“文革”中受冲击，家中的一些文物、字画等被抄没。久病之躯又遭到沉重打击，遂于1978年逝世，享年67岁。

张靖先生之母名陈霁轩，祖籍安徽，祖上与李鸿章为亲戚，亦系名门之后。自幼与弟陈厚济在舅父家中生活，舅父姓孙。陈夫人与表妹孙琪方朝夕相处，感情甚笃。后孙琪方与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结婚，故陈夫人与孔德懋、孔德成姐弟亦经常来往。解放前夕，孔德成夫妇携陈厚济同去台湾，临行前曾邀陈霁轩夫妇同行，被婉拒。至台后，陈厚济即协助孔德成管理财务。“文革”期间，孔德成致函陈夫人，陈夫人立即持函至派出所，在民警面前，信未启封即被撕毁，以示“划清界限”，信函内容无从知晓。解放后，陈夫人和张恺骥先生同在西城区干部业余学校教书，亦任语文教员。1956年张先生患病后，完全由陈夫人一人照顾，遂无法继续工作，只得亦办理退职手续，此后家中生活渐入窘境。陈夫人于1991年病逝。

张恺骥先生于1950年购得槐宝庵5号院，原槐宝庵庙址用以自住。房产证注册的产权人系夫人陈霁轩女士。

庙内的佛像和各种法器遂被撤除，当时院内的古槐和树上的铁链尚存。因年代久远，铁链已嵌入树干内。院内有井一眼，以后将铁链投入井内，古槐亦枯萎，遂伐之。“文革”期间，私房归公，院内迁入许多住户，遂沦为大杂院。至上世纪80年代初，私房落实政策，发还原主，院内房屋才逐渐收回。1984年，因家中生活困难，遂将前面的一进院——大金丝胡同35号院，售予司新合。新业主司新合于1987年将前殿拆除，在院内建二层楼房，并将原山门改为随墙门（即今日之大金丝胡同35号）。故时至今日，原山门、原前殿之格局以及石镌匾额等均不得见矣。

张家仅住原槐宝庵之二进院及三进院，即现门牌为大金丝胡同甲33号院（原槐宝庵5号旁门）。陈夫人晚年体弱多病，主要由张靖先生照顾。她病逝后，院内房产由张禾、张明、张建和张靖四位子女



今日大金丝胡同甲33号

共有。后除张靖外，其余三人都分配了宿舍，遂将自己名下的房屋都转售给张靖，现在张靖是此宅院的唯一产权人。

### 组建“奥运人家”

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什刹海地区成为北京的重要民俗旅游区。这一带的住户遂利用自己的住房组建“奥运人家”，兴办旅游事业，接待外国游客。

张靖先生遂于2000年将此宅院予以整修，将原东西配殿改成东西厢房各三间，另新添建了三间倒座南房。这些建筑均系顶覆仰合瓦，元宝脊，灰砖墙，纯系典型的传统北京民居规格。三间正殿保持原来的明代格局，柱、梁、架、檩等木结构未动，仅对屋顶挑顶大修。原西耳房尚存，东耳房已无，于是建成一座传统的四合院。

在张靖先生引导下，笔者参观了这座院落。

大金丝胡同甲33号（原槐宝庵5号旁门）之院门，辟在原槐宝庵二进院之东北角，系一座坐西朝东的小院门。清水脊灰筒瓦门楼，两扇木门，其上镶有一对铁兽面门环，门板上布有门钉，门楣上方悬一扇面形匾额，上书“桐苑精舍”，盖因院内有一梧桐树也。

院内三间北房，系原槐宝庵之正殿，高大宏阔，巍峨壮丽。殿基有二尺多高，正中有五级青石垂带踏垛。前出廊，正中悬匾——涵虚堂。檐下的柁檩上仍保留有昔日的彩绘，虽年代久远，多已漫漶不清，但有一幅仍能看出龙形图案。方形窗棂属明代风格，系金丝楠木料。顶覆筒瓦，卷棚顶。廊檐前部的勾头滴水，均系绿琉璃瓦，有龙形图案。翻修时，曾留下几块琉璃瓦，上刻有“雍正八

年”“各工应用”字样，现陈列室内展览。其余部分多为灰筒瓦，间有少量黄、绿琉璃瓦。张靖先生介绍，在其记忆中北房屋顶一直如此，至于“逾制”一事，现尚无法解释。三间大殿本系连通的，“文革”中砌墙隔开，权充居室。现将北房东侧一间布置成传统的老北京客厅兼书房，室内有架几、条案、八仙桌、太师椅、旧式书桌、樟木箱柜，其上镶有黄铜饰件、拉手和铜锁。墙上挂有名人字画。多宝榻内陈设古瓷和珍玩，此室专供游客参观，不出租。北房当中一间系主人张靖的会客室，西侧一间和西耳房系主人张靖起居室，西耳房兼做厨房。西耳房前面的露地上搭建一间厨房，供住客自己做饭使用。

三间东房系客房。北侧一间布置成传统的老北京新婚洞房，靠后墙砌一座砖炕，木质炕沿，上铺红缎被褥，有中式小炕桌，上方悬挂红纱幔帐，玻璃窗上贴有大红“喜”字。屋内有镶黄铜饰件，带黄铜锁的中式衣柜以及小条案。此屋系几年前应一对加拿大新婚夫妇要求专门布置的。他们在此愉快地度过蜜月之后，此室就保留下来，专供新婚夫妇居住。正中一间悬匾——汇珍斋，系游客的会客室兼饭厅。迎面一张四面可折叠式可圆可方的八仙桌，两侧一对官帽四出头式高背木椅，十来把普通木椅，墙挂字画。南侧系一间普通客房，有席梦思双人床，雕花小型罗汉床，带黄铜饰件的中式小柜橱，以及书架、座椅等家具。

三间西房亦系客房。北侧一间系中式客房，有中式雕花双人木床，上铺粉花被褥，上方悬挂藕荷色幔帐。镶有黄铜饰件的硬木中式衣柜，以及太师椅等家具。正中一间悬匾——倦勤斋，设两张单人

床，当中以中式床头柜隔开，床铺藕荷色被褥。有中式硬木立柜，小条几和木椅等家具。南侧一间系西式客房，备有一张席梦思双人床、西式衣柜和座椅等家具，挂淡绿色窗帘，附设专用卫生间。

南房三间，东西两侧均系卫生间，兼供沐浴和洗衣。当中一间系工作人员宿舍。

院内原有太湖石堆成的假山，以及枣树、槐树等多种花木果树，环境清幽，然早已不存。现将残存的太湖石，旗杆石和柳叶石等石料，在院内布置了石桌、石几、石凳，添置了陶瓦鱼缸等庭设施。缸内饲金鱼数尾，缸侧置石榴数盆。院中央有梧桐树一株，西厢房前植葡萄一架，南房前种月季，蔷薇数丛。搭建天棚一座，将倦勤斋和汇珍斋连接起来。葡萄架和天棚连在一起，晴天可遮阳，雨天可蔽雨，往来于东西厢房之间，可无日晒雨淋之虞也。盛夏时节，挺拔高耸的青桐和浓密的葡萄叶，使得院内绿荫匝地，充满凉意。置身院内，虽三伏酷暑天，亦无炎热难耐之感。天棚下悬挂的几笼禽鸟，时而模仿人语：“你好！”“恭喜发财！”不仅活跃了院内的气氛，更给人以欣喜、愉悦和宽慰。

北京人喜爱石榴树，“榴开百子”是句吉祥话，象征了多福。春末，石榴含苞如拳，象征团圆、美满；夏初，榴花绽放，则又似笑口常开，象征喜庆和欢悦。“五月榴花照眼明”又预示着生活的红火。“天棚、鱼缸、石榴树”系老北京四合院中的必要陈设。

夏秋时节，饲养的几只蝈蝈，在葡萄架下的蝈笼内发出和谐悦耳的鸣叫声。午饭后，这颇具节奏感的鸣声好似催眠曲，使人精神放松，得到一个酷美的午梦。精巧秀丽的蝈蝈笼，有的呈鸟笼形，有

的呈楼阁状，有的犹如葫芦，也系一件隽美的工艺品。翠绿的蝈蝈居中鸣叫，颇为赏心悦目，使人的眼、耳和心境均得到美的感受。

花、鸟、鱼、虫系老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四大休闲要素，在这座奥运人家内可谓诸品俱全。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使人切身体验到老北京人温馨、和谐、宁静的生活情趣。

什刹海地区的三轮车胡同游颇具特色。镶嵌黄铜饰件的黑漆车身，紫红色帆布车篷，车内冬天有棉毯，夏天有凉席。车夫统一着装，上身白小褂，下身青裤子。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各个路口，等候顾客。不少外国游客乘坐这种三轮车，在车夫的引导下来此院参观。

2008年，西城区政府授予此院“奥运人家”称号，参加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家属，曾来此院居住。西班牙马德里市市长、泰国某市市长，以及韩国国防部官员等都曾来此院参观，并题词、签名、留影。

平日则主要接待一些国内外的普通游客，除了供游客住宿，体验老北京人的生活情趣之外，一些旅游团队亦来此院参观，由导游用外语向外国游客介绍院内的建筑布局，老北京的各种民风民俗以及生活特色等等。

这座已有四百余年历史的古刹，在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期间，成为奥运人家，为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人文奥运和弘扬北京的民俗文化作出贡献。

笔者在收集史料过程中，曾多次访问了此宅院主人张靖先生，承蒙热情接待并提供了翔实史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西城区档案局积极完善全流程标准化的服务格局

一是以服务群众为核心，提升窗口服务水平。二是规范工作流程，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三是挖掘档案资源，编研成果丰硕。四是实施口述档案收集，抢救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活历史”“活档案”，增强文化自信。

## 新版《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指南》编制完成

新版《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指南》于2017年底付梓面世。该书全面介绍西城区档案馆南北两馆概况、馆藏档案和资料内容、查阅利用档案方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日常管理规定及其他相关信息的工具书，为档案查阅利用者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并利用西城区档案和资料情况提供了极大便利。

## 《北京西城往事10》刊发后受热捧

西城区档案局遴选自2017年《西城追忆》精华的《北京西城往事10》已经出版。本次刊发书籍，结合了微信公众号的宣传，扩大了阅读受众，也为读者了解此书编撰背后的故事提供了平台，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可以免费索取该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称赞。

## 西城区档案局全面推进档案服务民生工作

2017年，区档案局充分发挥档案公共服务效能，全年共接待查档利用者11304人次，提供利用档案9367卷（件），复制扫描馆藏档案23171页，开具证明9493份，利用数字化档案9520件，为区委、区政府决策，编史修志、个人利用、工作查考和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了大量档案依据。

## 2018年区委区政府机关文档工作早谋划早部署

西城区档案局机关文档科代管区委、区政府、区纪委监委等所属25个单位档案，为切实做好2018年工作，机关文档科印发了《关于部分立档单位2017年归档情况的通报和2018年归档工作安排》，继续加强对机关各部门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立卷和归档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 西城区档案局积极研究2018年工作

2018年1月4日至17日，西城区档案局领导班子连续听取了各科室工作汇报，明确提出2018年工作思路，即：完成五大档案任务攻坚，使十九大精神在首都核心区档案战线落地生根。一是推进法治

建设，在依法管档治档上攻坚。二是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在落实党建主体责任上攻坚。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档案服务为民上攻坚。四是坚持文化自信，在大力弘扬西城档案文化上攻坚。五是坚持首善的工作标准，在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上攻坚。

## 西城区档案局多种形式推进依法治档显成效

2017年，西城区档案局采取多种措施在全区范围内深入开展档案法治宣传教育，取得较好效果。一是重视对领导干部的档案法治宣传，档案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党校。二是打铁还须自身硬，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三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将学习内容纳入双随机行政执法检查中。四是点面结合开展全面营造全区群众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档案法治环境。五是多形式多渠道加大档案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 “西城档案”微信公众号助推西城档案文化宣传

西城区档案局自建立“西城档案”微信公众号以来，目前发布原创图文102篇，阅读总数达27356次，阅读人数11551人。该平台拓宽了档案服务渠道，丰富了档案宣传交流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为传承历史记忆、弘扬西城文化做出贡献。

## 西城区档案局为区“两会”提供咨询服务

2018年1月9日，西城区档案局参加了西城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咨询活动。接待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131人次，与会的区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对档案局在弘扬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对于《西城追忆》《西城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越办越好。

## 西城区档案局为《北京档案》杂志建言献策

2018年2月2日，西城区档案局应邀与其他15个区档案局同仁为《北京档案》建言献策。西城区档案局结合创办多年《西城追忆》刊物的经验，为《北京档案》在档案文化栏目设立上提出了希望刊物能够增加档案文化方面的内容量，以期更充分发挥档案助推当前重点工作的参考作用等建议。

### 节前检查防疏漏 档案安全重泰山

西城区档案局领导班子2月9日开展了档案安全检查，坚持关口前移，做到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坚决防止侥幸、松懈心里，认真贯彻执行档案各项规章制度，做到紧贴工作实际、补齐风险短板。

### 区档案馆北馆完成利用系统档案图像链接核查工作

为了在查档过程中能快捷浏览档案图像，方便出具查档证明，西城区档案馆北馆逐条查找“综合档案管理及利用服务系统”中20余万条目录未挂链接档案扫描图像情况的原因，积极与设计公司进行协商修改，核查工作已于2018年2月底完成。

### “北京市西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档案分中心”正式挂牌

按照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和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持续提升行政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要求，西城区档案局在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对政务服务体系专业分中心挂牌进行了统一设计和制作，将标有“北京市西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档案分中心”字样的新牌匾挂在了门口墙上。

### 西城区档案局业务科室前往门头沟档案馆参观交流

2018年3月1日，在西城区档案局李勇副局长的率领下，局管理科、利用科、文档科相关人员一行六人，参观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档案馆和北京地方税务局档案馆，在交流学习中开阔了思路、增长了见识、促进了工作。

### 规范工作流程 完善开放目录

根据北京市档案局整合档案资源、规范工作流程的要求，西城区档案馆开放档案目录完善修改项目采用购买外包服务的方式，对馆藏1984年至1986年近30万条档案目录进行规范修改完善。

### 聘用法律顾问 提供法律咨询

西城区档案局连续三年聘用法律顾问，有效保证了本局工作更加规范化、法制化。特别是在国家档案日暨北京市档案馆日及12.4宪法日的活动中，更加广泛高效地宣传了档案法律法规、普及了档案知识，为尊崇法治、依法治档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 区档案局举办2018年文书、照片归档培训

西城区档案局指导科于2018年3月27日举办西城区档案局2018年文书、照片档案归档培训，共74个立档单位，90余人参加。培训从文书、照片档案整理及归档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到归档数据库的操作都做了详细的讲解。并于课后进行了1对1答疑，切实保证了听课效果。

### 区档案局开展对库房烟感、温感报警系统的检测工作

2018年3月28日，西城区档案局与中消伟业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对区档案馆南馆库房烟感、温感报警系统的检测方面进行了安全检查，为预防库房火灾事故、确保纸质档案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后勤基础。

### 服务开放政府 完善鉴定工作

截止到3月底，西城区档案馆鉴定科依据《北京市档案局关于规范北京市区档案馆延期开放档案审批工作的通知》，对1980年至1984年到期档案进行了逐件重新审核鉴定，共鉴定了184个全宗，共计1万余卷、10万余件到期档案，并且重新修改了开放档案目录，目前已经通过了市局的审批。

### 西城区档案局助力“红墙意识”党性教育基地建设

西城区档案局（馆）积极参与筹办的西城区红墙意识党性教育基地，历经约半年的统筹谋划建设，4月2日正式对外开放接待参观。为高质量完成好“红墙意识”党性教育基地建设的政治任务，西城区档案局派出两名科级业务骨干加班加点参与基地的谋划设计和布置，并依托大量真实档案资源，出谋划策，为党性教育基地的如期揭幕做出了应有贡献。

### 区档案局管理科参加北京市民国档案著录软件培训

2018年4月3日，西城区档案局管理科工作人员参加了由北京市馆区县处组织的民国档案文件级目录著录软件安装及使用培训会，通过此次培训，极大增强了我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并带回了较为专业的档案著录软件设备，为接下来的民国档案目录著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